



新生命書局發行

果夫先生百正

著者贈

周佛海聲

精神建設與民族復興

M6
D673.69
5011
2

周佛海著

精神建設與民族復興

新生命書局發行



3 1799 4285 3

自序

民族的地位，這樣低落，國家的形勢，這樣危險，究竟我們怎樣纔能救亡圖存，以至於復興呢？這個問題，我想每一個有血性的中國國民，沒有不時嘗研究，想求得一個解答，作我們努力的指南的。我自己也就是這些人中間的一個。政制改革，吏治刷新，農村繁榮，工業振興，財政整理，金融安定，交通發達，軍事建設，教育普及，乃至外交方略，民衆組織，以及一切和民族復興有關的各問題，沒有不大略的或精細的研究過。但是想來想去，終覺得這許許多的問題，即使有了辦法，似乎還缺少了一個先決的條件。就是這許許多的事業，甚麼『人』

去擔負這許許多多的任務，甚麼『人』去完成？於是乎覺得『人』的問題，乃是一切問題的先決的和根本的問題了。而要解決『人』的問題，又要先轉移社會風氣和改變時代精神。這本小冊子的任務，就在說明這個理由，而且提出一個極平常、極凡庸，然而極重要、極根本的民族復興的辦法。

因為工作忙閑的關係，這本小冊子，是在或作或輟，時斷時續的情形之下寫完的。中間中斷了一兩個星期，乃是常事，甚至中斷了一個多月。因為這個原因，所以所述的理論或許不能前後呼應，所引的史實，或許間有錯誤，都是難免的事。希望讀者不要以詞害意。

周佛海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五日於南京。

精神建設與民族復興目次

自序

第一章	精神建設的意義和重要	一
第二章	從歷史上觀察時代精神和民族盛衰的關係	四〇
第三章	數十年來各種運動的演進及其失敗的總因	七〇
第四章	精神建設的目標	九六
第五章	精神建設的原則和方案	一四六

與復族民與建設神權

第二章 精神建設的意義和重要

中國目前急迫需要解決的問題：是瀕於破產的農村，怎樣救濟；將要崩潰的金融，如何安定；呻吟於外國傾銷政策之下的民族工業，怎樣維護；每年巨量的入超，怎樣減少；乃至與社會經濟，民衆生計有關的一切困難，如何打破，一切方案如何實施。總而言之，中國目前所切迫需要的，是物質建設。滿足人民的物質生活，充實民族的物質力



(南)

量，乃是民族存亡的關鍵。理想生活、精神文明，乃至講道德、說仁義，既不足以救濟社會的窮困，也不能夠充實民族的力量。所以在物質貧乏的中國現在，要講精神建設，一定有人認為逃避現實的玄學論，不切實際的唯心論，或時代錯誤的復古論。甚至會認為以拜佛求神祈禱復興的時輪金剛法會一類的舉動。

但是我們的意思並不如此。物質建設之必須發展，不必等到現在，看見人家物質力量的雄厚，物質文明的進步，然後才感覺到。『衣食足而後知榮辱，』『倉廩實而後知禮義，』『富之教之，』『足食足兵，』這一類的道理，我們的祖先，在數千年以前，就遺下教訓給我們了。我們決不是提倡精神萬能，我們不是要人赤手空拳，單以精神的力量，

去和敵人的飛機大炮奮鬥；也不是要人露體空腹，以精神的力量，去克服飢寒。我們覺得精神和物質，是交互爲用的。完成精神建設，正所以完成物質建設。因爲精神的要素沒有具備，精神的條件沒有充實，物質的建設，根本就不能完成。即使能夠完成，而物質的力量，也不能充分發揮或利用，甚至或因物質供給的豐富，物質生活的優良，反使社會墮落，政治腐敗。所以爲完成物質建設起見，爲充分發揮和利用物質力量起見，爲保障物質效用，不被惡用起見，我們要從物質建設的另一方面，同時努力精神建設。

一個民族的興亡，一個朝代的隆替，小而至於一個家庭的盛衰，一個人的成敗，原因雖然複雜，條件雖然繁多，不能以一元論的方式

來說明；然而精神作用，可以說是根本原因和主要條件。民族將興，朝代將隆，家庭將盛，個人事業將成的時候，一定先具有一種發揚蹈勵，堅苦卓絕，勇猛精進的精神。反之，一個民族將亡，一個朝代將替，一個家庭將衰，一人的事業將敗的時候，一定先表現頹唐墮落，萎靡浪漫，巧詐虛浮的精神。這種事實，我們只要翻開歷史，到處都可以找得出。就民族說：希臘當極盛的時候，和波斯戰爭，能夠舉國一致，同仇敵愾，勇猛奮鬥，至死不屈；及至將亡的時候，羅馬軍至，則望風披靡，百城迎降。羅馬亦何莫不然。當其共和之初，尙勤儉，重武俠，儼然有開國的精神；到了末季則驕奢淫佚，文弱柔脆。故爲野蠻民族所侵略，終至於滅亡。再看中國的歷史，無論金人、元人，以及滿清，當其侵略中原，開基創

業的時候，何一不是具有樸實勇猛，堅苦奮發的精神。到了將亡的時候，則以前的樸實勇猛，早變爲安逸脆弱，以前的堅苦奮發，早變爲頹廢淫靡。失去了開國的精神，其結果遂至於亡國。至於朝代興衰和精神的關係，實例更多，不必細舉。我們只舉一兩個同一朝代的同一君主，初年和晚年的精神現象和治亂的關係來證明。唐玄宗的開元時代，因爲他自己發奮淬勵，所以一班的臣僚，也振作努力，因此當時的政治，號稱盛世。到了天寶時代，他自己因日趨於享樂荒淫，一般的士氣也怠惰浪漫，致引起安祿山之叛。唐室因此大亂，這是一個例。清室的乾隆，當即位之初，襲祖宗的大業，頗曉得振作，所以有清一代的文物制度，到了乾隆時代，才算完備。這個時候，可以算是清室的極盛時

期。到了晚年，因為驕奢荒廢，以致吏治廢弛，人心睽離，而釀成嘉慶以後的民亂。所以乾隆時一方面是清室極盛的時代，同時也是開始衰落的時代。這也是一個例。根據上面的兩例，我們就可知不單是開國時代的精神，和亡國時代的精神不同，就是在同一君主的時期，如果初年是治，晚年是亂，一定因為他初年和晚年的精神不同。因為君主時代，君主一人，是一切政治社會樞紐，所以他一人的精神作用，可以影響及一般的精神現象，因而影響及一時代的治亂。至於一家的盛衰，一人的成敗，其原因由於精神的實例，更是到處都有，不必再舉了。這些說明，都是解釋所謂精神建設，並不是玄虛渺茫，不切實際的運動，更不是求神唸經，不合科學的行爲，乃是一切努力，一切奮鬥的根

本基礎。沒有這個基礎，就不會感覺到要努力，感覺到要奮鬥。即使因一時的衝動，偶然的刺戟，發生了這種感覺，也決不會持久，不會貫徹的。

精神作用的關係，爲甚麼這樣的重大？我們要進一步來研究了。無論甚麼事業，從天下國家的大事起，到一件極微極小的事止，總不外三個要素。第一是辦法或計劃，第二是辦法或計劃所憑藉以實施的物質，第三是運用物質，以實現計劃的人。計劃、物質、和人，這三個要素是缺一不可的。這和領土、主權、與人民，是構成國家的三要素一樣，三個要素中缺了一個，就不能成一個獨立的完全國家；也和土地、資本與勞動，是生產的三個要素一樣，三個要素缺了一個，就不能進行

完滿的充分生產。然而三個要素的不能互相缺少，不一定就是說三個要素沒有輕重之分，本末之別。我覺得在上述的三種現象，——事業、國家和生產——之中，人的要素，比其餘兩個要素，確是較爲重要，較爲根本的。有了人的要素，一時就缺乏其餘的兩個要素，還可以以人的力量去完備和充足，缺乏了人的要素，其餘的兩個要素，就是存在，也不能發生其作用。先就國家來說，沒有領土，當然根本就不能成爲國家，沒有主權，至少也不能成爲完全的國家；然而假使人民有出息，就是無尺地寸土，寄居異域，何嘗不能建基創業，開拓領土；就是主權被人剝削，何嘗不能挽回恢復，達到完全獨立。遠之白人在美洲的建國，近之波蘭的再建，土耳其的復興，就是最好的例證。反過來說：假

使人民沒有出息，就是擁有廣大的領土，何嘗不會日削月割，而至於滅亡；就是擁有獨立的主權，何嘗不會受人的剝削和侵害。偌大的非洲，被人分割，偌大的印度，被人滅亡，也是最明顯的例證。再就生產說：土地和資本，當然是生產的條件，沒有這兩個要素，勞動就沒有施行的憑藉和對象。然而假使人民刻苦耐勞，能充分發揮其勞動的力量，雖然不能填海洋爲膏腴，也可以化荒瘠爲肥沃，雖然不能無中生有的憑空創造財富，也可以化無用爲有用，變貧乏爲豐富，使財富的效用發揮，分量增加。反之，假使人民安逸怠惰，不能充分勞動，就是擁有廣大的土地，巨量的財富，也會因不能盡量利用，有等於無。總而言之：無論就國家言，就生產言，人的要素，比其餘的要素重要得多。根據這

個原則，我們來觀察最近幾十年來，中國一切努力不能成功的總原因。

最近一切事業，不能完滿成功的原因，不是歸咎於辦法或計劃不良，就是推諉於經費不足。這固然有相當的理由，然而決不是根本的原因。

辦法不良，計劃不善，是可以改變的。如果這個辦法不良，可以用別個良的辦法；如果這種計劃不善，可以改用別種好的計劃。在想辦法，定計劃的一方面，我們這幾十年來，實在也有了不少的努力。不過努力的表現和結果，不外下列兩種：一種是生吞活剝的移植人家的良法美制；一種是在過去已經行過的許多辦法中間走圈子。就第

一種現象說：近幾十年來，實在是流動不息的採用外國的辦法。看見人家一個有效的辦法，立刻整個的搬來，行到相當時期，沒有發生效用，另外又搬來一套。這一套還沒有成功，又搬進更新的一套。在外國行之有效的一切辦法，大概都試行過。政治制度方面，從君主立憲起，一直到共和、總統制、內閣制、議會制、中央集權制、地方分權制、委員會制；經濟政策方面，自國營政策、民營政策，以至最近所謂的統制、經濟政策；教育制度方面，德國制、法國制，以至美國制，都應有盡有的，全部或一部，半真或半假的玩過了一套；然而結果，都是失敗了。失敗的原因，是不是因為辦法不好？如果辦法本身不好，為甚麼人家施行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績，能夠使每一個辦法，都能完成他某一個時代的使命？

推敲這種失敗的原因，有人說因爲不合於中國的歷史；有人說因爲不適於中國的國情；有人說中國的幅員太廣，人口太多，不能適用單一的辦法；又有人說中國人民的程度不夠，知識太低；至於主持某一個辦法的人，則歸咎於別人的反對，辦事的掣肘。這些解釋，自然都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。然而只能說明一部理由，不能說明根本的原因。就第二種現象說，就是在曾經試行過的辦法中走圈子。向東走不通，反過來向西走；向西走不通，轉過來又向東走。朝南不行，轉而朝北，朝北不行，再轉而朝南。儘管向東南西北四方面走圈子，圈來圈去，還沒有出原來地位的一步。別的不說，姑且舉兩個明顯的例。關於地方行政制度，二十餘年來圈來圈去，還是復轉到原來的地位。清朝的地方行

政制度，是道、府、縣。革命以後，取消了道、府，僅祇存縣。民三四年間，回頭去恢復了道。以後不久，再轉過來取消了道。到了現在又轉回頭去設置道府式的專員制。就學制說，以前是中學、師範、職業學校分立的，以後規定可以將中、師、職三種不同的學校，合併設立；最近又回過頭去，規定中、師、職要分別設立了。至於省政府由省長制改爲委員制，現在又要由委員制，恢復省長制；縣政府由科設局，現在又要回轉去廢局爲科一類的事實，都不必再舉了。變來變去，忽東忽西，結果還是復歸原位，寸步未動。然而每一次更迭，每一回改組，地方和事業所受的影響，實在難以估計。固然，『窮則變，變則通，』此路不通，自然要另行別路。然而向東不通改而向西，是有意義的；向西不通，再轉而向東，就

沒有意義了；如果向東不通，又回頭來向西，就更加沒有意義了。移植外國的辦法，不能成功，還有種種理由，可以自己解釋，自己安慰；像這樣轉東轉西，圈來圈去，我實在想不出一個正當的理由去解釋。

上面所述，是說明我們過去在辦法上，在計劃上，也曾用過相當心思，也曾費了相當的力量。然而在這些辦法，這些計劃，於民族的生命，國家的前途，以至民衆的利益，是沒有多大的好處的。難道這完全是辦法和計劃本身的罪過嗎？實行和運用這些辦法和計劃的人，要負絕大的責任的。

我不承認過去從外國移植以及在國內轉來轉去的一切辦法或計劃，曾經真正的失敗過。因為我不相信這些辦法或計劃，曾經真

正的、切實的、比較長久的實行過。我覺得過去無論朝野上下，對於某一辦法的實驗，或某一計劃的施行，不是沒有誠意，就是沒有毅力。辦法或計劃的本身，是不會自動實現，自己生效的。一定要實行的人，先之以誠意，繼之以毅力，然後他們的效驗，才會漸漸的發生。如果形式上表面上，在實行某種辦法，而事實上，却並不是這回事，乃是利用某種辦法做題目，以達另外的作用。這就是無誠意。假使就是誠意的實行，或遇着相當的阻礙，或發現多少的缺陷，或暫時沒有積極的成績，就廢然若喪，停止試驗。這就是無毅力。無誠意固然不行，有誠意無毅力，也是不行。如果誠意和毅力，兩都缺乏，那就更不行了。爲甚麼沒有誠意？因爲一部分人要謀私利私益，而又不便明目張膽去爭奪，於是

就不能不假借一個口實，來標榜，來號召。他們所注意的，是私利私益，能否取得，至於表面所主張的辦法和計劃，能否真正成功，不是他們所必須顧及的。中央集權自有中央集權的好處，而袁世凱却利用集權做皇帝；地方分權，也有分權的理由，而軍閥却利用聯省自治，做割據的掩護；議會制度，當然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產物，而議員却利用來爭奪權利，甚至賄選；產業國營自然不失為一個經濟政策，而自命革命的人，却侵吞招商局的公款；其餘這一類的例，也不必多舉了。究竟是中央集權制失敗，或是因為實行的人沒有誠意？究竟是地方分權制失敗，或是因為主張的人沒有誠意？根本就沒有真正的主張，真正的實行，怎麼能怪辦法不好，為甚麼沒有毅力？第一，病於求治太急，希

望急功近利。今天實行一個辦法，明天就要收得效果；如果明天沒有效果，就覺得這個辦法不對，去另外謀新辦法，或回頭行舊辦法。第二，病於太過理想。主張一個辦法，總以為這個辦法，有百利而無一弊；實驗的時候，如果發現也有不完全的地方，或經人批評，指摘出來缺點，對於這個辦法，就立即失去自信，沒有繼行的勇氣。第三，病於看事太易，主張一個辦法，不去預料必有的阻礙，總以為必能順利進行，容易成功；一旦遇着困難，就灰心喪氣，改變辦法。因為這些原因，所以一個辦法的效驗未見，別個辦法已取而代之。今天一辦法，明天一計劃，變來變去，變不出一個結果。日本的學制，自從明治維新以後，一直到現在，幾十年間，沒有根本的改變過一次；我們的學制，在民國的二十幾

年間，已經改變了好幾次，現在又有人主張改革學制了。我們要曉得：第一，無論甚麼辦法，尤其是各種制度，至少總要行之十年八年，才有效果，不是三年五年可以見效，尤其不是一年半載可以成功的。我們自己要有毅力，要能忍耐，讓他有充分試驗的機會和時期，才能判斷其是非善惡。第二，無論甚麼辦法或計劃，絕沒有完全無缺的。利之所至，弊亦隨之，這是常識所能見到的。我們也要有毅力，能運用。不足的地方，加以補充，缺陷的地方，施以救濟，萬不能稍見弊端，就全部推翻。第三，無論甚麼辦法，有贊成的意見，也有反對的意見，有推動的力量，也有阻礙的力量。反對和阻礙，乃是意料之內的現象，絕不是意外的。我們一定要持之以毅力，去和緩反對，去消除阻礙。萬不能因為少數

的反對，些微的阻礙，便對於所主張的辦法，發生懷疑。然而這種毅力，過去是缺乏的。

以上說明過去一切辦法或計劃的失敗，不能完全歸咎於辦法，或計劃的本身，主張和實行的人，都應該負大部分的責任。蔣先生說：『官守相同，效率終異；技術相同，成就各殊；機械相同，功用不一。今欲求法令與技術之有效，其關鍵不在法令技術之本身，而在使用法令技術之人；欲求機械有效，其關鍵亦不在機械之本身，而在運用機械者之精神如何。』（見新生活運動綱要）就是這個道理。

再說物質：這裏所說的物質，包括很廣。從一切事業所必須的金錢起，一直到辦產業所必須的機器、原料，打仗所必須的武器，給養止，

都包括在物質之內。物質當然是很重要的一個要素。沒有金錢，當然不能辦事；沒有資本，當然不能經營產業；沒有武器，當然不能打仗。因之我們過去，事業不能成功，常歸咎於經費不夠；產業失敗，常歸咎於資本不足；打仗不行，常歸咎於武器不精。不過我們要知道：經費、資本、武器，以及其餘一切的物質，他們的本身是死的，完全看人怎樣去運用。運用得好，可以變貧乏爲豐富，變拙劣爲精良，變無用爲有用。運用得不好，豐富的可變爲貧乏，精良的可變爲拙劣，有用的可變爲無用。但是我們要能好好的運用物質，必須具有一種特殊精神。有了一種特殊精神，物質缺乏的困難，是可以克服的。蘇俄在革命初期，一方面受大戰的影響，別方面受外國的封鎖，國內的物質，異常缺乏。這是我

們所知道的。然而第一次五年計劃成功以後，生產日益發達，物質日益豐富，到現在全世界爲恐慌的惡魔所襲擊的時候，蘇俄獨沒有恐慌的現象。這也是我們所知道的。這便是變貧乏爲豐富的一個實例。他們何以有這樣的成績？這就不能不因爲他們具有一種特殊精神了。別的且不說，單舉一點來證明。幾年以前，聽見蘇俄的工人說：『在五年計劃成功以前，我們只求發展生產，協力建設，絕不計較本身的樂利。』現在他們又說：『在第二五年計劃成功以前，我們只求發展生產，協力建設，絕不計較本身的樂利。』工人『絕不計較本身的樂利』這便是蘇俄的特殊精神，這便是他們物質建設成功的基礎。返看產業幼稚的中國如何？當工人運動的初期，尤其是十五六年的時候，今

天要求增加工資，明天要求減少時間。要求不遂，小則罷工，大則暴動。而資本家方面，也只知道剝削工人，貪圖微利，絕不爲產業前途設想。大家都以自私自利的精神，『計較本身的樂利，』所以工商業日益凋落，——固然尙有其他的原因，如帝國主義者的經濟壓迫——幾陷於破產的絕境。精神作用的偉大，我們就可知了。再看十五年的北伐，軍閥武器的精良，十倍於我們。我們所恃者，步槍外，僅破爛不全的機關槍，大炮是絕無僅有。然而軍行所至，敵人望風披靡。精良的武器，失去了效用，反爲拙劣的武器所打敗。這乃是變拙劣爲精良的一個實例。我們何以有這樣的成績？這當然因爲我們的軍隊，有一種特殊精神，而軍閥的軍隊，沒有這種特殊的精神之所致。這也可見得精神

作用的偉大了。我不是說精神的力量，可以完全代替物質的力量，乃是說有了精神的力量，物質的力量，就越可以發揮；物質的力量不足，可以拿精神的力量來補充。中國是物質缺乏的國家，假使我們能使最少量的物質，發揮大量的力量，能使所有的物質，一分都不枉費，物質缺乏，也不會成爲嚴重的問題。我們試一回想：是否曾經浪費了許多有用的物質於無用之途？是否曾經暗吞了許多公家的物質，爲私人的財產？浪費和舞弊，乃是中國物質缺乏的重要條件。這兩個條件不除去，中國的物質，將永遠無豐富的一日。所以過去的失敗，不能完全歸咎於物質的缺乏，運用物質的人，應該負大部分的責任。蔣先生說：『衣食不足，可以人力足之；倉廩不實，可以人力實之。……衣食

不足，爭之盜之仍不足；倉廩不實，爲竊爲乞，仍不得實。……即使已足已實，而以爭盜竊乞行爲，施於人與人之間，衣食雖足，亦不能用，倉廩雖實，亦不能享。」（見新生活運動綱要）就是這個道理。

根據上述，就可知過去一切企圖和努力，不能成功的原因，不在辦法，也不是在物質，主要的是在人。辦法不好不足慮，物質缺乏不足憂，人不健全，乃是致命的打擊。所以我們現在根本的問題，就是培植健全的人；要培植健全的人，就要養成健全的精神。所以精神建設，乃是一切努力的基本工作。

要成爲一個健全的人，必須同時具有優越的知識和高尙的道德。這不是新奇高深的理論，乃是盡人所知的老生常談。因爲道德是

做人作事必須根據的原則；知識，是做人作事必須憑藉的工具。兩者是一不可的。沒有知識的蠢人，固然不能成功，沒有道德的壞人，何嘗不能敗事。所以精神建設，要包括知識和道德的兩個要素。

但是本文所論的精神建設，只就道德立論。這不是不知道知識的重要。我們深知過去幾十年受人壓迫的原因，是因為自然科學的知識太幼稚，物質的力量不及人；是因為社會科學的知識太落後，各種制度不如人。我們又深知過去許多喪權辱國的外交，不盡由於外人的強奪，乃是由於他們的巧取。因為許多交涉的失敗，完全由於我們的愚昧無知。過去的失敗，既然多由於知識幼稚，將來的成功，自然不能不靠知識的進步了。所以我們對於現代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

學的知識，不僅要以十二分的努力跟蹤追求，還要以十二分的速度，迎頭趕上。

本文之所以專論道德建設者：第一，因為在知識方面，過去確是有許多進步，現在還正在進步着，而社會道德，却日形墮落，至少沒有向上；第二，因為如果沒有高尚的道德做保障，知識愈優越，愈豐富，作孽作惡的能力就愈大，社會就只會受知識進步的弊害，而不能受他的利益。

先說第一點：現在有不少的人，指摘教育制度的失敗。他們的理由，是現在學生的程度日益低落，知識日益缺乏。他們每嘆現在的學生，不及他們當年。這種批評，我們是萬不能承認的。假使所謂程度和

知識，是指做八股，作詞賦；那末，現在的學生，確是沒有出息；他們竟沒有這種能力。然而現在十四五歲的學生，竟能懂無線電的粗淺原理，而且有時還能修理簡單的收音機，我們當年能不能？十一二歲的高級小學生，能夠述美國獨立和法國革命的經過，我們當年能不能？就是就文字說，十一二歲的學生，半點鐘內，可以寫一封白話家信，而當年的秀才寫信，要參考『寫信不求人』還要唸唔大半天。這些事實，都是我個人親見的，我想絕不限於少數學生，乃是比較普遍的現象。再看近年：許多偉大的工程，都是中國人任工程師；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，也因學者的研究，有了不少的進步和貢獻；淞滬之戰，長城之役，我們也能夠應用最進步的武器，和敵人抗戰。義和團暴動時，『洪鈞

『老祖已命五龍守大沽，夷兵當盡滅。』（御史徐道焜之奏）『得關壯繆帛書，言夷當自滅。』（御史陳嘉言的話）一類可笑的思想，現在究竟沒有了；以前中學的數學格致教員，要聘日本人擔任，現在大學教授却多是中國人；政府各部的外國顧問，以前有絕大的勢力，他們的權威，現在却大減退了。這些事業，都是證明教育失敗，程度低落，和知識破產嗎？所以我覺得知識方面，我們是在着着的進步，只要照這樣加緊努力下去，我們的知識，將來是可以應付各種問題和事件的。

然而社會道德，却正相反的不獨沒有向上，而且日益墮落。我不是說以前的社會道德，如何高尚，如何理想。我只說世風日下，以前雖然不好，現在更加不好罷了。留學時罵人貪污的人，一旦有了機會，比

他所罵的人要貪污十倍；沒有當局的時候，罵當局因循敷衍，一旦上台，其作事之不認真，不負責，要爲他的前人自嘆不及；批評別人爭權奪利，不顧大局的人，遇到自己利害關頭，竟可犧牲民族，不願放棄私利。其餘虛偽、狡詐、傾軋、排擠、徇情、推諉、逢迎、浪漫、淫靡等現象，日甚一日，幾至視爲當然，不以爲怪，不以爲恥。這些都是事實，不必詳述，只要留心觀察，到處都可看見。這種風氣，誰能說不是亡國的現象？如果立卽努力改變，一切問題，實在都無從談起。這便是本文在精神建設中，專論道德建設的第一個理由。

再論第二點：知識是一種工具，他本身是沒有善惡的，可以用以爲善，也可用以爲惡。所以我們萬不能以爲只要有了優越和豐富的

知識，人羣一定可以得到福利。如果用之不得其當，知識愈優越，愈豐富，人羣所受的害就愈大。科學發達，是一件極好的事；如果我們利用科學，去發達社會的生產力，去增加社會的財富，科學對於人類，才能說是有貢獻。如果利用科學，去發明殺人的武器，科學就應該受詛咒了。這乃是很正確的道理。中國幾十年來，知識確有進步，上面曾經說過。那麼，民族的地位，應該因知識的進步而提高；國家的危難，應該因知識的進步而減少；社會的福利，也應該因知識的進步而增加；誰知結果適得其反。知識越進步，民族、國家和社會的情形，愈益惡劣，愈益危險，愈益不堪問。我們政治科學的知識，雖然進步，而政治現象，並沒有多大的改進；我們經濟科學的知識，雖然進步，而社會經濟愈益衰

落；我們自然科學的知識，雖然進步，而物質的生活，愈益窮困；推究他的原因，一方面因爲沒有將知識用到好的方面，同時別方面且惡用知識去作奸犯科，舞弊營私。駕駛飛機，在國難嚴重的現在，當然是極可寶貴的知識和技能；然而却有人利用駕駛飛機的技能，運紅丸嗎啡。法律知識，在力求國家法治化的現在，當然也是人人應該具備的常識；然而却有人利用法律知識，去敲父母的竹槓；能寫幾個字，就寫恐嚇信；懂得會計，去造假單據。諸如此類，因爲知識越高，作惡的本領越大的事實，實在不少。幾令人有一切罪惡，假知識以行之感。王陽明所謂：『記誦之廣，適以長其傲也；知識之多，適以行其惡也；聞見之博，適以肆其辯也；辭章之富，適以飾其僞也。其名稱借號，未嘗不曰吾欲

以共成天下之務，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，以爲不如是，則不足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。』真不啻爲現在寫照。如果照這樣下去，知識就不斷的提高，不斷的增加，不僅於國計民生沒有好處，而且將使社會愈益紛亂，國家愈益危險。難道這都是知識本身的不好嗎？實因爲缺乏一種保障知識不被惡用的條件。這種條件，便是道德。這便是本文在精神建設中，專論道德建設的第二個理由。

道德的建設，應該有怎樣的具體目標？換句話說，就是我們應具有那幾種美德？這個問題，等到後面詳細討論。現在要指出的，就是我們現在所要建設的道德，不僅是消極的，而且是積極的。

『恢復民族固有道德』我們常常聽見這個呼聲。單只恢復民

族固有道德，是不是能達到我們所謂道德建設的目的？換句話說，是不是能夠滿足現在的需要？這確是要考慮的問題。祖宗遺留的各種美德，自然應該發揚光大；然而一方面發揮道德的民族性，同時不能不承認道德的時代性。中國現在，無論那一方面，經濟建設、政治制度、以及社會組織，都要努力現代化；同樣，我們的社會道德，也要努力現代化。在民族性的基礎上，加以時代性的成份；換句話說：一方面不要忘却民族的要求，別方面能夠滿足時代的需要，才能達到我們所期望的道德建設的目的。

我們的民族，本來是非常重視道德的。在過去幾千年的歷史記載中，不單是充滿了關於正心、誠意、養性、修身的教訓，而且有不少的

賢哲，躬行實踐。在才和德的兩個要素中，我們的民族特性，是重德甚於重才的。不過過去關於道德的教訓和修養，除少數例外，大概是偏於消極方面的。本來中國道德觀念的正統思想，當然是孔子的學說。而孔子的中心主張，原是『中庸』之道，決非偏重於消極的。因為後世學說駁雜，和時代演變的結果，遂漸漸以消極保守爲重。因此遂養成我們民族的一種特性；只在訓勉人有所不爲，不是鼓勵人有所爲。經濟方面，注重節慾，而不注重發展生產；政治方面，注重減政，以『政減刑輕』爲盛世。秦始皇、漢武帝，被史家批評爲好大喜功，商鞅和王安石一類的人，不獨當時身敗名裂，後世還受指摘。所以道德方面，也只注重『潔身自好』、『獨善其身』的功夫，雖然『一介不取』，然

而也『一介不與。』至於殺身成仁，慷慨赴義的志士仁人，雖然也史不絕書，但是理想的道德標準，却只是無爲、淡泊、不趨炎、不附勢、不爭權、不奪利、不損人、不害物。總之，道德修養的目的，在養成一個與人無競，與世無爭的品行端正的君子。這是中國道德的特色。這樣的道德標準，是不能適應現代的潮流的。所謂不能適應，不是說他根本不對，不好，而要去打倒，乃是說他不夠，不足，要加以補充。換句話說，就是固有道德的現代化。現代所要求的不單是潔身自好的君子，而且要是見義勇爲的國民。一個人不能潔身自好，一定不能見義勇爲，所以消極的道德是不對的；但是，潔身自好的人，不必一定能夠見義勇爲，所以消極的道德是不夠的。『一介不取』固然應該提倡，『一介不

與』却不應該鼓吹；損人利己，自然應該抑制，損己利人，何嘗不應主張。因為民族和社會，需要我們的貢獻甚多，需要我們的犧牲也不少。消極的道德，只能做到不犧牲民族和社會的公利公益，以獲得個人的私利私益；積極的道德，却鼓勵犧牲個人的私利私益，以完成民族和社會的公利公益。這種積極的精神，是我們現代所必需，是我們現在要努力建設的。

最後，我們研究士氣和民風的關係。一般知識份子的時代精神，假定名之為士氣；一般民衆的時代精神，假定名之為民風。所以整個社會的時代精神，可以名之為某一社會的風氣。所謂精神建設，不僅指士氣，而且要包括民風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所需要的，不僅是知識份子

的精神建設，而且是一般民衆的精神建設。尤其是在各國無不準備全體國民總動員的時代，民族前途的責任，不是少數知識份子所能負擔，一定要全體國民羣起努力，才能渡過民族的危機。而要全體國民羣起努力，就非先促成其精神的自覺，使其曉得努力的必要；再促成其精神的建設，使其有努力的心理的基礎不可了。

精神建設的最後目標，固然是在民風，而首先要注重的却是士氣。這是因爲有兩個理由：第一，中國幾千年以來，一直到現在，甚至於到最近的將來，是士大夫政治；一般民衆，幾與政治沒有關係，也沒有以政治爲自己應負擔的責任，或應參與的權利。這個現象好不好，乃是另外的問題，事實如此，却是不能否認的。士大夫既然是政治的唯

一負責者，政治好壞，當然以士大夫能否完成其責任以爲斷，而能否完成責任，又視其有無健全的時代精神，有無健全的士氣以爲斷了。士氣既然足以直接影響政治的治亂，所以精神建設，首先注重士氣。這是第一點。第二，士大夫不僅在政治上居負責的地位，而且在社會上也居領導的地位。士大夫的言論行動，無形之中，可以左右社會的趨向。所謂『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，必偃。』就是這個道理。民風的厚薄，完全以士氣如何爲轉移。所以要建設健全的民風，首先要建設健全的士氣。這是第二點。根據這兩個理由，我們覺得國難能否渡過，民族能否復興，首先要看我們的士氣如何了。振作士氣，是我們目前比甚麼還要緊的問題。

上面千言萬語，都是在說明精神建設的意義和重要。根據上述，我們可知精神建設，是民族復興的基本工作，既不是逃避現實的玄學論，也不是不切實際的唯心論，更不是時代錯誤的復古論。日本現在正在極力鼓吹『精神國防』，可見得人家對於精神建設，也加緊的努力。我們如果以為別人侵略的手段，專恃物質的力量，那便大錯特錯了。我們一方面要迎頭趕上人家的物質建設，同時對於精神建設，也萬萬不能落人之後。

第二章 從歷史上觀察時代精神和民族盛衰的關係

前面曾經說過，一個民族的盛衰，一個朝代的興亡，時代精神的作用，乃是根本原因或主要條件。朝代興亡的實例，我們無暇研究，現在且從歷史上觀察民族盛衰和時代精神的關係。

中華民族和異族的衝突，自有史以來就已發生。在長時期的衝突中間，互有勝負，有時我民族雖然勝利，然而至多也只能把他們逐

出塞外，不能根本消滅；有時我民族且爲其所窘，而不能不以和親政策來緩和。遠古不必論，自周以來，即有所謂戎禍。一見迫於獫狁，再見辱於犬戎。秦漢以後，匈奴遂爲我民族的大患，以秦始皇的雄才大略，也只能築長城，以謀消極的防禦。漢高祖以開國的英主，且被圍受窘於白登。漢武帝時，雖然有衛青、霍去病等威震漠北，然而卒不能犁庭掃穴，組繫單于。匈奴之患，遂與漢代相終始。不過中華民族，雖然自有史以來，就不斷爲異族所侵擾，所窘迫，而在五胡亂華以前，異族終不能入主中原，以統治宰割我民族。自五胡亂華開異族入主中原之端後，神明華胄，就常爲異族所征服了。嗣後五代時的唐、晉、漢、宋代的遼、金，還不過征服並統治黃河流域。等到元人亡宋，清人滅明，簡直征服

中國全土，統治中國全國了。異族之所以能征服中國，固然有地理的、經濟的、軍事的、各種條件，然而當時我們民族精神的凋弊和墮落，實在是根本原因。現在且來研究每次將被異族征服時，我們的民族精神，是怎樣的現象。

五胡亂華，乃是中國歷史的一大轉變。因為他的性質，和過去反覆迭演的改朝換代的亡國不同。顧亭林論當時的形勢道：『有亡國，有亡天下，亡國與亡天下奚辨？曰易姓改號，謂之亡國；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，人將相食，謂之亡天下。』因為這個時代，羌、氏、胡、羯，迭興遞盛，縱橫蹂躪黃河流域，二百五十多年，真所謂犬羊奔突，豕蛇橫噬，使江山改色，宇宙腥膻。民族既被異族所宰割，實可以叫做亡天下。當

時之所以釀成亡天下的嚴重局面，固然因為君主的荒淫庸愚，和內亂的迭起，使雜居內地的異族，乘機暴發。然而主要原因，還是因為朝野上下的風氣凋弊，精神墮落。就朝廷說，魏晉的創業，乃是「欺人寡婦孤兒，狐媚以取天下。」不顧道德信義，純用權謀詐術。此其一。晉武平吳以後，窮極荒淫，不理政事，帝嘗問劉毅曰：「朕可方漢何帝？」對曰：「桓靈。」帝曰：「何至於此？」對曰：「桓靈賣官，錢入官庫；陛下賣官，錢入私門，以此言之，殆不如也。」帝大笑曰：「桓靈之世，不聞此言，今朕有直臣，固為勝之。」當時的政治狀況，可想而知。此其二。取天下之時，既以權詐，取天下之後，又復荒淫，晉室子弟，受這種家庭教育，耳濡目染，自然就形成篡奪爭鬥的思想，淫亂奢華的風氣了。至於一般

士大夫的風氣，更不堪設想。干寶晉紀總論道：『風俗淫僻，恥尚失所，學者以莊老爲宗，而黜六經；談者以虛薄爲辨，而賤名檢；行身者以放濁爲通，而狹節信；進仕者以苟得爲貴，而鄙居正；當官者以望空爲高，而笑勤恪。』士氣如此，怎麼能免異族的蹂躪？所以『國亡於上，教淪於下，羌戎互僭，君臣屢易。』（晉書儒林傳序）當時的風氣，大約可以分兩點觀察：第一，是貴通達，賤名節；第二是尙虛浮，重放蕩。關於第一點，就是毫無忠孝的觀念，廉恥的思想，只要有高官厚祿，不單是可以今日事甲主，明日事乙君，就是非我族類的羌胡，也可以爲他們佐命立功。王船山謂『俄而事此以爲主，而吾之富貴也無損；俄而事彼以爲主，而吾之富貴也無損；奪人之大位以與人，見奪者卽復得焉，而其

富貴也亦無損。」這實在是當時士大夫的心理，所以晉室大臣可以「相率臣於劉聰、石勒，觀其故主青衣行酒，而不以動其心。」（顧亭林語）求其見危授命，慷慨赴義的志士仁人，實在如鳳毛麟角，不可多得。我們看看劉聰陷雒陽，執懷帝，百官無一死者，就可見當時廉恥道喪的士氣了。關於第二點，就是因為要避禍全身，羣趨於消極無爲，放浪形骸，至養成清淡之風。晉書王衍傳：「魏正始中，何晏、王弼等祖述老莊，立論以爲天地萬物，皆以無爲爲本，無也者，開物成務，無往不存者也。陰陽恃以化生，萬物恃以成形，賢者恃以成德，不肖者恃以修身。故無之爲用，無爵而貴。」因爲有這種無爲的思想，所以競尚浮靡，不問世事，以至於醉生夢死。晉書阮籍傳：「籍本有濟世志，屬魏晉之際，

天下多故，名士亦少有全者，籍由是不與世事，遂酣飲爲常。又劉伶嗜酒，常乘鹿車，攜一壺酒，使人荷鍤隨之，曰『死便埋我。』其餘風流放誕的事實，也不必多舉。不獨在野的人士如此，就是身在廊廟之上，負政治責任的人，也終日清談，無所事事。以風流浪漫爲高士，以實心任事爲俗人。王導、謝安都是東晉政治上的第一流人物，然而却也領導羣士，趨向虛浮。當時也有看不慣這種情形的，想來糾正。如陳頴遺王導書謂：『中華之所以弊者，在俗尙浮華，以務實爲固陋。老莊虛談，傾惑朝廷。夫欲制遠，先自近始。今宜更張，獻拔樸茂，然後徐舉大業，庶幾可冀中興。』然而王導不能聽，却將西晉駘蕩之風，維持在東南半壁。又謝安與王羲之登冶城，悠然避想，有高士之志。羲之規之曰：『夏

禹勤王，手足胼胝，文王盱食，日不暇給。今四郊多壘，宜思自效，而虛談廢務，浮文妨要，恐非當世所宜。』但謝安仍不能超出清談的頽風。當時士氣的萎靡頽廢，也可想見了。

前面說過，五胡亂華，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轉變。而魏晉的風氣，也是歷史上空前的凋弊。民族精神，這樣墮落，民族地位就隨着低下，正如銅山西崩，洛鐘東應，其中的因果關係，絲毫不會錯的。

五胡亂華以後，中國歷史上最混濁，最黑暗的時期，莫過於五代。這個時期，從一方面看，是異族蹂躪中國，篡奪繼續不已，從別一方面看，是廉恥道喪，社會上不復知有所謂節義。因為自唐亡以後，不過五十二年之間，皇帝換了十三個，國號換了五個，姓氏換了八個，羣雄竊

據方隅的，前後有十二國。五個國家之中，後唐、後晉和後漢，都是出於胡族。歷史上，國祚之短，篡奪之烈，沒有比這個時期還要厲害的。而當時的士大夫，因為要保全生命，貪圖祿位，常反顏事仇，不復知有所謂廉恥。如馮道以一身而事五朝八姓十一君，國存則圖保祿位，國亡則圖苟免。而且這種無恥的人物，反為當時所傾服。風氣之壞，於此可知了。至於像張全義一樣，身為佐命，豔妻弱女，相率被淫於朱溫而感恩流涕。照我們看來，簡直不是人類，然而當時却是司空見慣。這種紛亂混濁的局面，其原因不是一朝一夕。推溯起來，可以說是唐代所釀成。就是唐代風氣的卑屈，乃是五代紛亂混濁的根本遠因。

本來，中華民族的最盛時期，歷史上常常漢唐並舉。唐代的文治

武功，且超過漢代，然而因爲其風氣遠不如漢，所以一方面是漢族極盛時期，同時也是漢族開始衰弱時期。固然，唐室的衰亡，表面上有形的原因，不能不歸咎於女寵、宦官和藩鎮。初葉以後的女寵亂政，中葉以後宦官的專擅和藩鎮的跋扈，都是唐亡的重要原因。而風氣的敗壞，不能不說是根本原因了。當時風氣的敗壞，可分兩點觀察：一爲不顧廉恥，不講氣節的鑽營；一爲不論是非，只顧利害的黨爭。

關於第一點：當時的所謂士子，在沒有聞達之前，常投牒自進，奔走於王公大人之門，冀得其提拔，不以自薦爲羞。士子多戴破帽，策蹇蹻，奔走干謁。未到門百步，卽下馬奉刺，再拜以謁於典客者，羣呈其平日所做的文章。這叫做『求知已』。如果這樣沒有得到結果，就把前

次拜謁的把戲，再來一次，這叫做『溫卷』。如果這樣還沒有得到一願，就日夕在門前等候，等到大人先生出外的時候，乘機執轡於馬前，自己報名求謁。舊唐書薛謙光上疏論當時的舉人道：『馳驅府寺之門，出入王公之第，上啓陳詩，唯希欬唾之澤，摩頂至足，冀荷提攜之恩。故俗號舉人，皆稱覓舉。覓者自求之稱也。夫徇己之心切，則至公之理乖；貪仕之性彰，則廉潔之風薄。』這便是當時士大夫求仕進的情形。就是賢如韓愈，也不免上書干謁。我們看他一再上宰相書，就可知其求售之切了。至於當時求謁者，揣摩大人先生之詞色，以爲喜懼的情形，以及自己推求何以不見用的情形，在韓愈與陳給事的書中，描寫得最淋漓盡致。『……閣下位益尊，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，則愛博而

情不專。愈也道不加修，而文日益有名。夫道不加修，則賢者不與，文日益有名，則同進者忌。始之以日隔之疏，加之以不專之望，以不與者之心，聽忌者之說，由是閣下之庭，無愈之迹矣。』這一段就是表示求謁者沒有被用，而自己研究其原因的心理，因此且怪及同謁者的忌妬。書中又道：『去年春，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。溫乎其容，若加其新也，屬乎其言，若閱其窮也。退而喜也，以告於人。……及其還也，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。邈乎其容，若不察其愚者，悄乎其言，若不接其情也。退而懼也，不敢復進。』這樣伺候詞色以爲喜懼的心理，何等可憐可恥。以韓愈之賢，尙且如此，其餘的人更不必說。所謂『伺候於公卿之門，奔走於形勢之途，足將進而趨，口將言而囁，處穢污而不羞，……』就

是當時的風氣。求仕的時候，既然這樣卑鄙，一旦得仕之後，要保持其祿位，或要得更高的祿位，當然甚麼無恥的行爲，都可以做了。獻媚於女主，屈膝於節鎮，依附於奄宦，乃是當時求富貴利達的捷徑。士大夫既羣趨於女主，節鎮和奄宦之門，所以他們的勢力就越大，專擅就越甚，而爲禍也就越烈了。

就第二點說：唐朝中葉的黨爭，對於風氣，也有極壞的影響。同時也可以說是當時風氣凌替的結果。本來，所謂朋黨，在唐代以前，漢末也曾經有過。不過唐代的朋黨，却不能和漢末的相提並論。第一，因爲漢末的朋黨，其主體乃是士大夫，其對象乃是宦官，所以當時的黨爭，乃是士大夫對宦官的鬥爭。而唐代的黨爭，則雙方都是士大夫，乃是

士大夫的內訌。當時士大夫以外的一般的情形，正如司馬光所謂：『閹寺專權，脅君於內，弗能遠也；藩鎮阻兵，陵慢於外，弗能制也。』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士大夫不能同心協力，去設法遠閹寺，制藩鎮，乃自相水火，互相排擠，甚至勾結藩鎮爲外援，串通宦官爲內應。所以宦官、藩鎮之禍，終至於使唐滅亡。第二，漢之朋黨，雖然也難免爲意氣之爭，然而主要還是爲國家大事。因此，士大夫都很重氣節。當時雖然政亂於上，而俗清於下。唐之朋黨，除爭意氣外，主要的是爭功名。因此，他們的離合聚散，完全以勢利爲標準。有勢則合，勢盡則離；有利則聚，利盡則散，無所謂道義。至於爭奪的方法，也極陰險狡詐，攻訐排擠之能事。只要能制服敵黨，甚麼寡廉鮮恥的事都可以做，更無所謂氣節。所以唐文

宗有『去河北賊易，去朝中朋黨難』之嘆。一般的風氣既然這樣，學風也就不能不敗壞了。柳宗元與太學諸生道：『大學生聚爲朋曹，侮老慢賢，有崇飾惡言而肆鬥訟者，有凌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，其退然自克，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。』學生結黨和囂張的情形，於此可見一斑。

以上所述的，就是當時的風氣。梁啓超批評唐代的風氣，說是『上半期柔靡卑屈，下半期混濁。』這種柔靡卑屈和混濁的風氣，就是唐亡的根本原因，也就是五代釀成黑暗狀態的遠因。

前面曾經說過，五胡亂華，乃是中國歷史的一大轉變，因爲從這個時期起，漢族才爲異族所征服。但是自宋以後歷史上的轉變就更

大了。這種轉變，可以從兩點觀察：第一，此後異族征服中國，不像五胡亂華時之爲局部的、暫時的，乃是統一中國全部，如元如清，或大半部如金，而且時期是比較長久的；第二點更加要緊，就是從此時起，整個的漢族和整個的異族接觸，在民族鬥爭的形式下，被異族征服了。因爲五胡雖然是異族，但是入居內地很久，只算是中國的編氓，除據有中國的土地外，別無根據地。不過乘着中國政治腐敗，揭竿而起，割據稱雄罷了。所以就性質說，和中國內地的盜賊無異，或和割據的藩鎮無異。但是遼、金、元就不然。他們都是自有土地的，他們都是自成一國的，他們都是以整個民族，從外部來侵略中國的。所以整個漢族，被整個異族所征服，而且較長時期的全部征服，乃是從宋代開始的。這種

歷史的轉變，比五胡亂華，要有更深刻，更嚴重的意義。

宋室之所以被異族征服的原因，自然因為武備廢弛；而武備廢弛的原因，又是因為兵制不良，和內重外輕。這個理由，此地不必詳說。此地要注意的，就是當時的風氣不健全，乃是積弱的根本原因。

據顧亭林的意見，各代的風氣，東漢最美，炎宋次之。他道：『宋史言：士大夫忠義之氣，至於五季，變化殆盡。……藝祖首褒韓通，次表衛融，以示意嚮。……於是中外薦紳，知以名節爲高，廉恥相尙，盡去五季之陋。故靖康之變，志士投袂，起而勤王，臨難不屈，所在有之。及宋之亡，忠節相望。』宋代的風氣，既然這樣優美，爲甚麼我說他不健全？爲甚麼且說他因爲不健全的風氣而亡國？這是因爲當時風氣不健全，可

分兩點觀察：第一，乃是士大夫徒爭意氣，互相攻訐，至意志不能統一，人才不能集中；第二，是因為雖然有一部分人砥礪名節，而大部分人仍是寡廉鮮恥。

宋室之所以積弱，大部分是由於士大夫的黨爭。因為當時就內部言，既沒有像唐室那樣的宦官的專擅，也沒有藩鎮的割據，政權完全脫離了武人閹宦之手，而歸士大夫主持。就對外言，宋對於遼，雖然始終處於弱者的地位，然而自澶淵議和以後，差不多一百二十年，沒有大動干戈。對外戰爭，不過陝西一隅，因為西夏造反，連兵五六年罷了。外面既在相當期內，沒有強敵的積極侵略，內部又沒有武人閹宦的掣肘，正是士大夫齊心協力，為國效忠的好機會。那曉得他們的黨

爭迭出，越演越烈。由政治上的黨爭，變爲學術上的黨爭；以後竟不問是非，不顧利害，純變爲意氣之爭了。宋室的黨爭，發源於仁宗時的呂夷簡和范仲淹之爭，釀成所謂慶曆黨議。這個時候，還可以說是小人和君子之爭，因爲呂夷簡和夏竦或者可以看做小人。到了英宗時的所謂濮議，便是君子和君子的意氣之爭了。到了神宗時王安石主政以後，新舊兩黨的互相排擠，互相攻擊，黨爭就更烈了。這個時候，還可以說是政策之爭。最奇怪的就是舊黨之中，也分爲以程頤爲領袖的洛黨，以蘇軾爲領袖的蜀黨，和以劉摯、梁濤爲領袖的朔黨，勢如水火。但是所爭的，並不是國家的大計，參加爭論的人，却是當時所謂的君子。史家論洛蜀之爭，論道：「軾與頤合志同方，出處不易。熙豐之際，或

堅臥山林，或放逐湖海，一朝遇主，攜手偕行。方冀其一心奉公，更化善政……而口語參商，攻訐競起，初不聞有國家大政，爭若新法……右頤者，詆軾曰：『謗訕，右軾者，詆頤曰：『矯激……嘲侮小嫌，詬誶靡已，卽盈朝之上書，猶家人之室門耳。』可見這種黨爭的無意義，無價值了。等到蔡京、章惇一上台，不問蜀黨、洛黨都一網打盡，又變爲小人對君子的黨爭，而北宋就亡了。

南宋黨爭的激烈，也不下於北宋。當高宗流離轉徙，宋室存亡斷續的時候，就有黃潛善、汪伯彥等反李綱、宗澤的鬥爭。等到南渡之局初定以後，就發生歷史上最有名的秦檜謀害趙鼎、岳飛的大風浪。以後秦檜的禁絕程學，以及韓侂胄反對朱熹，禁絕其所謂偽學，並其門

人弟子而禁錮之，黨爭之禍就越演越烈了。

以上所述的宋朝士大夫的權利之爭，政見之爭，意氣之爭，實在和宋室的衰亡，有絕大的關係。因為有了黨爭，定有黨派的消長升沉；在各派消長升沉的變動中，難免要用報復的手段。於是小則貶竄，大則殘害。這就不僅意志不能統一，而人才也就不能集中了。在大敵當前的時候，人才不能集中，意志不能統一，國家怎樣能免衰亡？

復次，宋因藝祖提倡節義，風氣本為之一變，士氣之盛，僅次於東漢。但是自從王安石援引新進浮躁之士以後，希榮貪利之徒，一時羣起趨炎附勢，士氣就逐漸凌替。安石新法的是非，不必去論，其用人不當，却不能辭咎。史稱其『老成正士，廢黜殆盡，僂慧巧佞，超進用事。』

實在沒有冤枉他。所謂『笑罵由他笑罵，好官我自爲之，』就是安石力薦的鄧綰所說的話。至於安石一手提拔的呂惠卿，後來却是反對安石最力的人，這乃是他自己也認爲極痛心的事。史稱『呂惠卿迎合安石，建立新法。安石故力援引，驟至執政。惠卿既得志，有射羿之意，忌安石復用。遂欲逆閉其途，凡可以害安石者，無所不用其智。一時朝士，見惠卿得君，謂可傾安石，以媚惠卿，遂更朋附之。』這不單表示呂惠卿是忘恩負義的小人，更可見所謂『一時朝士』之無恥了。這種無恥的風氣，可以更舉兩個例來證明。『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，諛佞無恥。』等到蔡京一當權，就一變而請求毀司馬光和呂公著的神道碑。又舊黨當權時，周秩爲博士，親定司馬光諡爲『文正。』

及至蔡京當國，却請求斷司馬光的棺，而鞭其屍。反覆無恥，一至於此。就是蔡京自己，每至罷相，必涕泣拜懇乞恩。這種無恥的風氣，到了南宋更加厲害。『韓侂胄當國時，許及之對之屈膝。侂胄憫之，命同知樞密院事。後值侂胄生辰，羣公上壽，既畢集，及之適後至，爲閹者所拒，大窘，俯身由門中闖入。當時有由寶倫書屈膝執政之語。』又，『侍郎趙師罷者，諂事胄，無所不至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，過山莊，顧竹籬草舍曰：『此真田舍間氣象，但欠犬吠雞鳴耳。』俄聞犬噪叢薄間。視之，乃師罷也。』廉恥道喪，到了這個程度，所以元兵一到，朝野雖不乏死節的忠臣義士，究竟沒有奴顏婢膝，認賊作父的那樣多。就是北宋之末，也是一樣。宣和七年十二月，太學生陳東伏闕上書，請誅蔡京、童貫。

以謝天下。次年正月，李綱被罷，陳東又率一班太學生和民衆，去伏闕上書，搥壞登聞，喧呼動地，殺內侍，並要驅打李邦彥。士氣之盛，誰不佩服。不幸是年十一月汴京被陷，金人索太學生博通經術者三十人。照理在這種熱烈的民衆運動之後，應該沒有人應聘了。那曉得竟有三十人欣然就道。金人只要三十人，就有三十人；如果再要多些，不怕沒有人應聘。一般的風氣如此，就是有少數節烈之士，怎樣能挽回頹勢？

宋室積弱的結果，致中國民族，整個爲外族所征服。宋室之所以不能強盛的原因，固然也因爲制度等問題，然而風氣不健全，沒有使國家強盛的精神要素，實在是根本的原因。

再看明朝。有明一代，在中國民族的歷史上，占有很奇怪的地位。

就是驅逐蒙古，恢復漢族的地位的是明，而亡於滿族，使漢族重爲異族所征服的也是明。爲甚麼一時能驅逐異族，後來又爲異族所征服？其中的原因，當然很複雜，然而根本的原因，還不能不說是明朝中葉以後的風氣敗壞了。明初的風氣，本來很純樸。明太祖雖然起身草澤，而且刻薄寡恩，戮辱臣僚，以致摧鋤民氣。然而提倡儒教，網羅人才，命有司察舉賢才，以德行爲本，文藝次之。所以當時風氣的純厚，也僅次東漢。試看『英宗初年，王振亂政，末年曹石政亂，憲宗時代，汪直亂政，武宗初年，劉瑾亂政，朝士有觸犯之者，多遭廷杖，謫戍之禍，重者或處死刑，而翰詹科道與部寺小臣，抗章彈劾，視之蔑如。知有國而不知有身，知奸人之當去，而不知己身有禍害，蓋自太祖卽位以後，百餘年間，

尊崇節義，敦勵名實，儒教之道德，漸潰於社會，寢成爲風俗矣。」這種純正的風氣，中葉以後，就漸漸變壞了。士大夫的卑鄙無恥，享樂奢淫，以及黨同伐異，越弄越甚。其無恥的情形，只要看一看宗臣報劉一丈書，就可以知道了。魏忠賢當國時，「浙江巡撫潘汝楨，疏請建忠賢生祠於西湖，賜額曰『普德』。」勒石記功德，閣臣撰文書丹。蘇松巡撫毛一鷺繼之。自是諸方效尤，幾徧天下。疏辭揄揚，稱以「堯天舜德，至聖至神。」……章奏無巨細，輒頌忠賢，稱廠臣不名。山東奏產麒麟，閣臣票旨言：「廠臣修德，故仁獸至。」監生陸萬齡，請以忠賢配孔子，忠賢父配啓聖公。……士習如此，人心如此。朝野上下，無貴無賤，俱奴顏婢膝，低首下心於權閹之下，以求富貴。禮義廉恥，業已喪盡，明事遂不可

爲矣。顧亭林也說：『自萬曆季年，縉紳之士，不知以禮飭躬，而聲氣及於宵人，詩字頌於輿皂。至於公卿上壽，宰執稱兒，而神州陸沉，中原塗炭，夫亦有以致之矣。』這種不顧廉恥，貪求祿位的人，自然只圖自己享樂，不去實心任事。所以顧亭林又嘆道：『今日士大夫，纔任一官，卽以教戲唱曲爲事。官方民隱，置之不講。國安得不亡！身安得不敗！』根據上述幾個引證，我們就可知當時風氣敗壞，和明朝衰亡的關係了。

當時的風氣，還有個很壞的地方。就是結爲朋黨，互相攻訐。無論所謂君子或小人，都捲入黨爭的潮流。爭權利，快恩怨，逞意氣，圖報復，而置國家存亡於不顧。就是所謂君子，也因為好名之念所驅，流於矯

激，爭發不切實際的空論。標奇立異，而形成所謂唱高調的空氣。當時的派別，有所謂東林黨、宣崑黨、齊黨、楚黨、浙黨，以及附和宦官的閹黨。朝野上下，喧呼聒噪，排擠軋轢，勢如水火。趙翼在廿二史劄記內敘述當時的情形道：『萬曆末年，廷臣務爲危言激論，以自標異，於是部黨各立，另成一門戶攻擊之局。高攀龍、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，士大夫多附之。旣而挺擊紅丸，移宮三案，紛如聚訟。與東林忤者，衆共指爲邪黨。天啓初，趙星南等柄政，廢斥殆盡。及魏忠賢勢盛，被斥者，咸欲倚之，以傾東林。於是如蛾赴火，如蟻赴羶，而科道轉爲其鷹犬。……權璫藉言官爲報復，言官又藉權璫爲聲勢。此言路之一變，而風斯下矣。崇禎帝登極，閹黨雖盡除，而各立門戶，互相爭勝之習，則已牢不可破。是非蜂

起，叫嗽嚙，以至於亡。』這種黨爭的風氣，一直到明亡以後，桂王流離轉徙的時候，還很厲害。明史呂大器等傳贊說：『明自神宗而後，寢微寢滅，不可復振。撥厥所由，國是紛嗽，朝端水火，寧坐視社稷之淪胥，而不能破除門戶之角立。故至桂林播越，旦夕不支，而吳楚之樹黨相傾，猶仍南都翻案之故態也。』照這樣，明朝二百九十四年的天下，就隨着黨爭的潮流而消滅。而神明華胄，又爲異族所宰割了。

總而言之：五胡亂華，五代之亂，遼金元的侵入，和滿清的統治，這四個時期，是漢族最痛心最恥辱的時期。而其所以釀成這種局面的，固然有政治的、經濟的、社會的和軍事的各種原因，而歸根到底，不能不說由於時代精神的不健全。換句話說，就是由於風氣的敗壞。風氣

一敗壞，其結果就會使政治腐敗，社會紛亂，經濟困窮，和武力衰落了。上面歷史的敘述，可以證明這種解釋的正確。而所謂風氣敗壞，分析上面所述，可得六點：第一，貪圖祿位，不重名節；第二，奪利爭權，不顧公益；第三，徒逞意氣，不論是非；第四，萎靡頹廢，不事進取；第五，放縱享樂，不盡責任；第六，立異鳴高，不切實際。這六種風氣，就是使晉、唐、宋、明滅亡的原動力。『月暈而風，礎潤而雨，』風氣壞而國亡，其間的因果關係，決不是偶然的。讀過去的歷史，我們應該深加警惕！

第三章 數十年來各種運動的演進及其失敗的總因

自從鴉片戰爭，尤其是英法聯軍之役以後，有識之士，都感覺到中國國勢的不振和前途的危險。所以都焦心勞思，講求富強之術。自從清室中興以後，一直到現在，所有別國致富圖強，行之有效的方法，中國沒有不都行過。然而過去數十年努力的結果，只落得國勢愈危，前途益險。這究竟是甚麼原因？我們試來研究各種努力的經過，和其

所以沒有成功的原因。

最初感覺到外禍日亟，國勢阽危的，要算是清室中興的各名臣。胡林翼看見兩隻輪船，致急得吐血，每論到洋務，輒搖手閉目，神色不怡者久之，曰：「此非吾輩所能知也。」李鴻章論當時的形勢，也以爲是空前未有的險境。所以他一則說：「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，胥聚於中國，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。」再則曰：「今則東南海疆萬里，各國通商傳教往來自如，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。陽託和好之名，陰懷吞噬之計，一國生事，諸國構煽。實惟數千年未有之變局。」至於曾國藩、左宗棠等，也莫不感覺到西力東漸，爲中國將來的大患。所以他們於平定、太平、天國，及剿滅捻匪後，就集中心力，以應付這個「數千

年未有之變局。」他們覺得西洋的長處在船堅器利，曾國藩說：「輪船之速，洋礮之遠，在英法則誇其所獨有，在中華則震於所罕見。若能陸續購買，據爲己物，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，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。」李鴻章說：「西人專恃其槍砲輪船之利，故能橫行於中國，中國向用之器械，不敵彼等，是以受制於西人。」這種議論，足以代表當時有識之士的一般見解。所以他們應付這個變局的方法，就是做造堅船利器。以爲只要有了堅船利器，國家就可以強盛起來。可憐當時還有一般沒有知識的士大夫，還要反對這些政策。同治十一年，有人提議停止製造輪船。李鴻章在覆議的奏摺內批評他們說：「士大夫囿於章句之學，而昧於數千年來一大變局，狃於目前苟安，而遂忘二三十年

之何以創鉅而痛深，後千百年之何以安內而攘外。』據他的見解，以爲二三十年創鉅痛深的原因，是船不堅，器不利；後千百年安內攘外之方法，就是製造堅船利器。所以他堅決主張，『國家諸費皆可省，惟養兵設防，練習槍砲，製造兵輪之費，萬不可省；求省費，則必屏除一切，國無與立，終不得強矣。』在這種見解之下，所以當時努力的事情，主要是軍事建設。設機器製造所，製船廠，水師學堂，武備學堂，這一類的努力，不待說完全是軍事方面，就是興辦電報，修築鐵道，開辦礦業，和招商局，也以軍事的目的爲主，經濟的目的，尙在其次。而且當時設立所謂格致書院，講求聲光電化之學，也是爲學習軍事製造，準備基礎知識；還有派遣留學生，也主要的是學習海陸軍和軍器製造。總而言

之：這個時期的中心努力，可以說是軍事建設，如果廣泛一點說，也可以說是物質建設。就是第一個目的要圖強。因為要圖強所以連帶的目的，就不能不致富。他們這種見解，在當時實在是先知先覺。因為當時還有許許多多守經衛道的士大夫，大肆反對；因此他們的努力，也遇着不少的困難和挫折。我們對於他們的努力，只有表示敬意，決不能以為他們沒有達到富強的目的，而批評他們的見解為不對。然而這種努力的結果如何？嚴復論當時努力的結果道：『中國知西法之當師，不自甲午有事，敗衄之後始也。海禁大開以還，所興發者，亦不少矣，譯署一也，同文館二也，船政三也，出洋肄業四也，輪船招商五也，製造六也，海軍七也，海署八也，洋操九也，學堂十也，礦務十一也，電郵十

二也，鐵路十三也。拉雜數之，蓋不止一二十事。此中大半，皆西洋以富以強之基，而自吾人之行，則淮橘爲枳，若存若亡，不能收其效。『費了不少的心血，經過不少的困難所得的結果，是『若存若亡，不能收其效。』』等到甲午中日之役，一敗塗地，於是一班有識之士，又感覺到單只軍事建設，乃至物質建設，不能夠救亡。於是認識更深一層，努力變了個方向。

所謂認識更深一層，我們可以引梁啓超的話來說明。他批評李鴻章的新政，說是：『知有兵事，而不知有民政；知有外交，而不知有內政；知有朝廷，而不知有國民；知有洋務，而不知有國務……以爲吾中國之政教風俗，無一不優於他國，所不及者，惟槍耳、砲耳、船耳、機器耳。』

吾但學此，而洋務之能事畢矣。』其實這個道理，以前的當局也未嘗沒有見到的。郭嵩燾於光緒三年時，由倫敦致李鴻章書，就談到這個道理。他說：『兵者，末也。各種創制，皆立國之本也。』他的意思，就是主張不應只在軍事方面，努力建設，應從政治方面謀改革。李鴻章也並不是不明此理，只因爲阻力太大，單只軍事的設施，還遇着不少的障礙，怎能談政治的改革。他的覆書說：『兵乃立國之要端。欲舍此別圖其大者遠者，亦斷不得一行其志，祇有盡其力所能爲而已。』這就是說他雖然見到這個道理，但是力有未能。等到甲午戰後，不單是一部分有識之士，就是一些有爲的廷臣疆吏，也覺得非改革政淪不可了。譬如張之洞，也知道『不變其法，不能變器。』西藝非要，西政爲要。』

於是大家都以為只要一變法，一維新，國家一定就會有辦法，這一時期的主要努力，就是變法維新。戊戌的維新，雖然因為慈禧和光緒的暗鬥，受了很大的挫折。但是經過庚子之亂，辛丑之約，就是慈禧也知道不能反抗潮流，不論是真是假，總算得也主張變法維新了。辛丑所下的維新硃諭中，指出『晚近之學西法者，語言、文字、製造器械而已。此西藝之皮毛，而非西學之本源也。』所以主張『法令不更，錮習不』破；欲求振作，須議更張。』於是『著軍機大臣、六部、九卿、出使各國大臣、各省督撫、各就現在情弊，參酌中西政治，舉凡朝章、國政、吏治、民生、學校、科舉、軍政、財政、當因當革，當省當併，……各舉所知，各抒所見，通』限兩個月內悉條議以聞。』就這個硃諭看來，當時所要改革的範圍

很大，制度、政治、經濟、財政、教育、軍事，無不包括在內裏。事實上，在所謂回鑾以後，也有了不少的改革。大家以爲這樣的變法，乃是國家唯一的出路。等到日俄戰爭，日本戰勝之後，大家又覺得『日俄之勝敗，乃立憲與非立憲之勝敗。』於是又紛紛主張立憲。清廷也不能不表面敷衍，一則表示籌備立憲，再則派大臣出洋考察憲政。這個時候，朝野有識之士，又以爲立憲是國家唯一的出路，只要憲法一頒佈，只要國會一召集，國家立即就有辦法。於是各方面都紛紛要求立憲。在清廷和國民虛與委蛇之間，總理領導的革命，由武昌起義後，在最短的時問內成功了。專制君主的制度推翻了。以前求君主立憲而不可得，現在民主共和的制度，竟居然樹立起來了。以前所希望的國會也召

集了，約法也頒佈了。大家認爲是救國的辦法，國家的出路，都一一實現了。然而國家仍舊沒有得救。不僅沒有得救，而且使國家的情形，每况愈下，更不容易救。因爲大家認爲國家唯一出路的民主制度，不僅沒有發揮他的效力，而且產生了不少的惡果。民主制度，是離不開選舉的。但是中國選舉議員，則國民賣票；選舉行政首長，則議員賣身。選舉一次，則國民道德、政治道德就墮落一層。民主政治，是離不開政黨的。但是中國的政黨，則小派林立，時分時合，忽聚忽散，沒有特殊的政策，更無所謂主義，只是爭意氣，攘權利，爲一二武人軍閥作爪牙。於是彼傾此軋，政治現象，愈益分崩離析。在滿清的時候，還可以保着統一外形的國家，到了民國以後，反變成地方割據，國家解體的形勢。在這

種情形之下，再受了俄國革命的刺激，一般有識之士，感覺到要救亡圖存，非另想辦法，別謀出路不可。大家覺得只在上層謀政治的刷新，只在表面謀制度的改革，是不夠的；一定要由下層改造社會，由人的內心去改變思想，然後政治制度的革命，才有真正成功的可能。於是所謂新文化運動，就應運而生。自從民國七八年以後，一般有識有志之士，都努力於新文化運動，以為文化運動，是中華民族起死回生的特效藥。這種運動，雖然沒有具體的目標，他的理想，是在打破舊禮教的束縛和傳統思想的桎梏，以求個人人格的獨立和思想的自由。所以有人認為和歐洲『文藝復興』運動，有同樣的意義。就道理說，這種運動的理想，是有價值的，無可非議的。而且就其結果說，也是對於

麻木不仁的社會和衰老的民族，灌注了一劑興奮藥，發生了一種蓬勃的新氣象。本黨十三年的改組，以及以後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，都受了這種運動不少的影響。然而這種運動的更普遍的結果，就是：要求人格獨立，却獨立到個人不守團體的紀律，不受上級的命令；獨立到學生不服從師長的訓導，子弟不服從父兄的教管。要求思想自由的結果，竟自由到固有的學術道德，棄擲得乾乾淨淨，而盲從舶來思想的皮毛；竟自由到以民族生存為孤注，而試驗馬克斯、列寧的思想。學校鬧風潮，社會無秩序，比以前更加厲害，致使一般守經衛道的大人先生，反來指摘新文化運動的本身，要以讀經尊孔等復古的辦法來救濟。總而言之：新文化運動，雖然也有不少的好結果，然而却沒

有完成他挽救民族危亡的任務，沒有達到他復興民族的目的。所以就歷史的眼光看，新文化運動，也和造船製械、變法維新、民主共和等運動，一樣的歸於失敗。

我們從清室中興後的造船製械運動起，經過清季的變法維新運動，和辛亥後的民主共和運動，一直到民七以後的新文化運動止，作了一個鳥瞰，算了一筆總賬。我們所得的結論，就是：這些運動，都失敗了。所謂失敗，就是說，民族的生存，並沒有因為這些運動而鞏固，國家的地位，並沒有因為這些運動而提高。為甚麼民族和國家，沒有得到這些運動的好處？是不是因為這幾次的運動，不適合當時的要求？換句話說，是不是這幾次的運動，都是下的不對症的藥？不是的！我們

可以說，每次運動，都是針對當時的弊病，適應當時的需要的。換句話說，都是下的對症的藥。造船製械，乃至築鐵路、開鑛山、辦電報等一切物質的建設，不僅是曾國藩、李鴻章時代的需要，就是六、七十年以後的現在，何嘗又不需要？敵人現在之所以能侵略我們的，是因為他們有飛機大炮，是因為他們有雄厚的經濟力量。所以我們圖民族生存的重要辦法，仍然是從造船製械一貫下來的購機製炮，仍然是築鐵路、開鑛山等一套的物質建設。曾國藩、李鴻章能夠在幾十年以前，就見得到這個道理，實在不能不說是卓識，我們沒有理由說他們所開的藥方不對。而且我們現在所有的物質建設，除却無線電、航空、公路，是最近的成績之外，其餘主要東西，如鐵路、電報、招商局、造船廠、兵工

廠等，那一件不是承襲他們的遺產？最痛心的，就是他們所遺留的建設，有些甚至不能保存，而歸於消滅。所以第一期的圖強運動，方向並沒有錯。至於清末變法維新，也不能不說是切中時弊。平心而論，康有爲、梁啓超輩的根本錯誤，是在以爲在滿清的專制之下，可以實現變法維新，而不參加推倒異族專制的革命。至於他們所主張的改革制度，方向却沒有不對。入股是不是要廢除？雜亂無章的當時的中央機關，是不是要裁併？重床疊架的當時的地方機關，是不是要整理？雖然他們所主張的維新，僅及枝節的政制，未觸及根本的政體，然而他們所主張改革的，却適合當時的需要。所以第二期的變法維新運動，方向也並沒有錯。至於總理所領導的革命，所手創的民主共和制，那

更不能不說是適應世界潮流，切合民族需要了。所以第三期的民主共和制的實施，更是對症的藥了。至於第四期的新文化運動，也不能說他是錯誤。如果已經腐化，甚至已經僵化的舊的文化不更新，而以中古的思想，應付二十世紀的潮流；在中古的社會組織上面，建築嶄新的近代的政治經濟制度，是絕對不能成功的。要政治近代化，要經濟近代化，先要，至少同時要思想近代化，精神化。這實在是不能否認的道理。所以新文化運動，也是針對病症的運動。

根據上述，可知每次運動，都不是無意義，無根據的；都是切中時弊，適合需要的。爲甚麼每次有意義，有根據，而且切中時弊，適合需要的運動，每次都歸失敗？換句話說，每劑對症的藥，爲甚麼沒有一劑能

夠醫治病症？藥不對症，是藥不好；對症的藥，而不能醫病，其原因就不在藥的本身，而應該求於藥之外了。

這幾次運動之所以失敗的根本原因，就是缺乏足以使他們成功的精神的要素。不僅反對這些運動的人，大都出於自私自利的精神，就是直接間接參加這些運動的人，除掉極少數的領導者以外，也很少具有大公無私，忠實不欺的精神，誠心誠意的信仰他們所參加的運動，是挽救國家危亡的，唯一出路，而犧牲個人的一切私利私見，獻身於運動，而促其成功。所以每次運動初起時，所具的莫大的希望，都被營私舞弊，因循虛浮，逞意氣，爭權利等敗壞的風氣，打得粉碎，變為泡影了。

造船製械，以及其餘物質的建設，假使自曾李的時代起，一直到現在止，主持的人，都以廉潔切實的精神，負責經營，我相信中國軍事和經濟的基礎，一定不會像現在這樣薄弱。無奈主持的人，好的，還只敷衍故事，因循搪塞，壞的，甚至舞弊營私，貪蝕公款。嚴復說：『甲午之辦海防也，水底魚雷與開花彈子，有以鐵滓泥沙代火藥者。洋報議論謂吾民以數金鎊銖之利，雖使其國破軍亡，失地喪師不顧。則中國今日之敗衄，他日之危亡，不可謂不幸矣。』海防，誰能說不是挽救危亡的一個重要辦法，然而拿着『以鐵滓泥沙代火藥』的精神去籌辦海防，海防怎樣能夠完成他鞏固國家的任務？像這一類的事情，不但是在海防方面如此，其餘如電報、鑛山、鐵路、和招商局等事業，那一個

不把他們當做『閹差使』『肥缺』去幹。以這種精神去擔負富國強兵的事業，國怎麼能富，兵怎麼能強？日本的郵船會社和中國的招商局，是差不多先後同時成立的。到現在，郵船會社的船舶，世界各重要口岸，差不多都有他們的踪跡；招商局則奄奄一息，日陷於垂危的狀況；他的船隻，不僅不能出國門一步，就是在沿海沿江，也不能和外船競爭。這完全是因為兩者主持的人，精神不同，所以雖然是同樣的事業，而所得的結果，却有天淵之別。至於變法維新，也是一樣。假使戊戌以後，朝野上下，都一德一心，以國家生存為前提，不顧私利，不逞意氣，切切實實的去推行新政，以後情形如何變化，實難揣測。然而維新竟失敗了。戊戌維新的失敗，雖然是因為慈禧和光緒的暗鬥，慈禧得到

勝利，然而慈禧之所以反對新政和得到勝利的，却是因爲一般守舊大臣的包圍和贊助。而守舊大臣之所以反對維新，固然因爲他們知識淺陋，最大的動機，還是在自私。因爲裁併衙門，他們就要失職；因爲要舉辦他們不懂的新政，他們就要失勢。他們要失職失勢，如何不拚命的反對。所以戊戌裁併機關的諭旨一下，就『羣情大駭，謂帝大背祖宗制度，皆赴寧壽宮請太后保全收回成命。』梁啓超論當時反對維新的心理道：『……今守舊黨之阻撓變法也，非實有見於新法之害國病民也。吾所挾以得科第者，曰入股，今一變而務實學，則吾進身之階將絕也。吾所恃以致高位者，曰資格，今一變而任才能，則吾驕人之具將窮也。吾所藉以充私囊者，曰舞弊，今一變而覈名實，則吾子孫

之謀將斷也。……今既不辦一事，從容富貴，窮樂極欲，已可生得大拜，死諡文端，家財溢百萬之金，兒孫皆一品之蔭；若一旦變法，則任官者皆須辦事。吾將奉命而辦事耶？則既無學問，又無才幹，將不辦耶？則安肯舍吾數十年資俸奔競千辛萬苦所得之高官，決然引退，以避賢者之路哉！』這雖然描寫得過於刻薄，然而反對變法維新者的心理和動機，確實不外這樣。於是戊戌維新，遂在宮廷爭權，士大夫自私的風氣中慘敗了。辛丑回鑾以後，雖然接二連三的下維新的上諭，而且枝枝節節的也改革了不少的地方，甚至宣佈準備立憲，然而主持和參與的人，不過是應付環境，以平民憤，且藉以收拾人心，根本就沒有誠意。誠意，乃是一切事業的根本上精神要素；辛丑以後的維新變法，既

缺乏這種精神的要素，焉得不失敗？至於談到辛亥革命以後的情形，令人更要痛心了。辛亥革命成功，本來是民族的一大轉機。假使大家能夠實心實意的運用民主制度，改良國內政治，我們怎麼會使美國的獨立、法國的革命、和日本的維新，專美於前？不幸朝野上下，竟沒有一點開國的精神，盛世的風氣。滿清遺老不必說，就是革命的健將，竟可搖身一變爲洪憲的忠臣。至於其餘叛黨求榮，賣友謀官的事實，也不忍心去一一細舉了。留學的時候，罵政府腐敗，自己當了同，要加倍腐敗；在台下的時候，罵官僚貪污，自己執了權，要加倍的貪污；競爭選舉，甚麼狡詐陰險的手段，都可以做得出；獵取地位，甚麼卑污無恥的行爲，都視爲當然；打着救國衛民的招牌，實行禍國殃民的陰謀；日發

悲天憫人的論調，陰懷升官發財的野心。這些事實，我們也無暇去舉。在這種亡國的風氣中間，所謂民主，所謂議會，所謂約法憲法，在別國行之有效的，在中國怎樣能免慘敗？民主共和，既然不能發揮其效用，我們怎能怪民主共和的運動，不能挽救國家的危亡？最後，談到新文化運動的失敗，何嘗不是因為同樣的原因？新文化運動的性質，和上述三個時期的運動不同，他本身本來就是一種精神建設運動。上述三個時期的運動，因為缺乏精神的要素，所以不能完成當時希望他們完成的任務；本身是一種精神建設運動的新文化運動，却也因為參加運動的人，大多數缺乏健全純正的精神，所以也不能完成其應負的使命。打破吃人的禮教，本是改造不合人性，不近人情的舊風

俗的必要途徑，然而儂薄少年，却藉這個口號去荒淫亂交；發展個性，也是改革舊式教育的一種方法，然而不肖的學生，却因此主張廢止考試；其餘或利用自由解放的美名，不守社會的秩序，學校的紀律；或利用革命反抗的口號，在家反對父兄，在校驅逐師長；或以打倒偶像爲口實，而毀謗自己不願意的德高望重的前輩。總而言之：除極少數的領導者和純潔青年以外，大多數都是以新文化運動爲號召，而遂其私圖。因此，這種運動的結果，雖然喚起了一部分人認識舊社會的缺點，雖然也打破了一部分不良的風俗習慣，乃至傳統思想，然而即就他的好的方面說，其結果也都是消極的破壞的，沒有積極的建設一種開創的精神，新興的風氣。換句話說，新文化運動，雖然他本身是

一種精神建設運動，然而其結果，只做到精神的破壞，至於精神建設，却並沒有成功。因此我們希望他負擔的復興民族的任務，也不能完成。

根據上面的說明，可知過去四個時期救國家救民族的大運動，其所以不能完成其任務的，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救國家救民族的效能，是因為他們的效能，沒有得到充分發揮；其所以不能充分發揮的，是因為每個時期，都沒有一種健全純正的風氣，作他們的動力。一部龐大複雜的機器，要有動力，才能運行活動，如果不足動力，使機器活動，而怪機器本身不能動作，那真是倒因為果了。過去各種運動，都是缺乏一種動力。我們以後努力民族復興運動，要特別替這個運動，

製造一種動力。這種動力，就是健全純正的精神；製造這種動力的工作，就是精神建設。

第四章 精神建設的目標

精神建設運動，是民族復興這個大運動中間的許多運動的動力，這許多方面的建設運動，雖然各應特殊的需要，各具特殊的效能，然而沒有精神建設這種動力，他們的效能，不能發揮，他們對於時代的需要，也不能使之滿足。這個道理，前面已經詳述了。所以德意志的復興，雖然因為英主輩出，以及俾斯麥、毛奇一流的政治家、軍事家的

功勞，然而根究其根本，我們是要把首功，歸於斐希特的精神運動的。他在普魯士大敗，柏林被法軍占領的時候，深信德意志民族的復興，應從喚起德意志的精神道德，打破自私自利的心理入手，所以他從一八〇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起，到次年三月二十日止，每星期日晚上，在柏林『對德意志國民講演』。他針砭當日德人，大意說：一八〇六年普魯士之所以慘敗，是由於自私自利心的發達，人人只知有自我，而不知有全體，所以對內則偷竊，對外則怯懦，然而自私自利心發達到極點，就並一己的小利也不能保。所以他說，因自私自利而滅亡，乃是必然的結果，不是偶然的價值。因此，他提出德國自救的方法，是民族的道德改造。他以為民族因為道德墜落而衰亡，只有道德的改造，

才足以振興。因為斐氏的這種道德改造的精神建設運動，替德國創造了一種新生命，所以德國才有一八一三年和一八七〇年的復興。又如意大利的統一，雖然政治上，是加富爾的功勞，軍事上加里波出的力也不少，然而如果沒有瑪志尼的奔走呼號，在精神上，為意大利灌注一種新元素，意大利的統一運動，恐怕也不能屢敗屢起，再接再厲的貫徹到完全的成功。瑪志尼最注重個人的責任。他以為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，偏重權利，致社會形成散沙，沒有團結的可能。所以他主張意大利要復興，須從每個人各盡其責做起，他並且以為責任主義，可為意大利對十九世紀文化的新貢獻。因為他犀利的筆鋒，和暢達的演講，所以意大利的青年，受其鼓動的，莫不以統一意大利為

自己的責任，而且參加各種運動，以圖完成自己的責任。加里波，就是受瑪志尼精神的影響最大的一人。加富爾雖然和瑪志尼的意見政策，都有不同，而精神上，受他的刺激也不少。至於其餘愛國青年，就更不必說了。因為有瑪志尼替意大利這樣創造統一運動的動力，所以意大利也才有一八七〇年的統一成功。其餘如日本維新，雖然要歸功於伊藤博文等政治家的贊襄規劃，然而維新前陽明學派的各學者，也有不少的功效。他們目覩西勢東漸的形勢，根據知行合一的學說，一面鼓吹尊王攘夷，一面提倡躬行實踐，於是維新運動，才蓬蓬勃勃的卒底於成。根據這幾個歷史的實例，更可以證明中華民族的復興運動，一定要從創造新興風氣的這種精神建設運動做起了。

中國現在風氣的敗壞，精神的凋弊，實在是不容諱言，亦不必諱言的事實。但是我們不必悲觀，敗壞的風氣，不是不能變為純良的，凋弊的精神，不是不能使之振作的。顧亭林論兩漢交替時，風氣的變化道：『新莽居攝，頌德獻符者，徧於天下，光武有鑒於此，故尊崇節義，敦厲名實。所舉用者，莫非經明行修之人，而風俗為之一變。至其末造，朝政昏亂，國事日非，而黨錮之流，獨行之輩，依仁蹈義，舍命不渝。風雨如晦，鷄鳴不已。三代以下，風俗之美，無尙於東京者。』他又論五季和宋的風氣變化道：『士大夫忠義之氣，至於五季變化殆盡。宋之初興，范質、王溥猶有餘憾。藝祖首褒韓通，次表衛融，以示意響。真仁之世，田錫、王禹偁、范仲淹、歐陽修、唐介諸賢，以直言讜論倡於朝，於是中外荐紳，

知以名節爲高，廉恥相尙，盡去五季之陋。』他因下結論道：『嗚呼！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爲東京，五代之可以變而爲宋，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。』誠然，『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。』不過他自己是不會變，要人去變的。所以我們現在敗壞的風氣，能否變爲純良，凋弊的精神，能否變爲振作，完全看我們是不是努力去轉移，去建設來決定了。

我現在提出幾個純良風氣的要點，作我們精神建設的目標。明知所提出的，是極平凡的老生常談。然而世界上越是普通平凡的道理，越是我們一日不可缺的原則。世界上沒有比空氣和水還要普通的東西，然而他們對於人類，比甚麼還要重要。物質如此，精神方面，也是一樣。所以我們的精神建設運動，不必而且不宜好奇立異，提出人

所未言的目標：須就切實的需要，實踐口所常言，耳所常聞，而未能做到的道理。

第一，要掃除因私害公的風氣，建設爲公忘私的精神。勇於私爭，怯於公戰，差不多是傳統的一般風氣。沒有地位的，要爭地位；有了地位而沒有權力的，還要爭權力；有地位而又有權力的，再要爭意氣。只要是關於個人利害的問題，沒有不以十分的勇氣和努力去鬥爭的。爲國家或社會的問題，平時也未嘗不焦心勞思的去憂慮和謀劃；也未嘗不胼手胝足去經營和設施；然而一遇公私利害相衝突的時候，就自然而然的擲公家的利益於不顧，而顧全私人的利益；甚至爲取得或保全私人的利益，不惜犧牲公家的利益。這種事實，觸目都是，舉

不勝舉。即就清高的教育界而言，我們常見爲保持教員一個人的地位，不惜犧牲學生的學業，不惜破壞學校的風紀，而鼓動風潮。在各縣地方派別衝突的時候，這種現象，更加常見。爲爭一個單級小學，或爲保持某派一二領袖的『面子』起見，不惜鼓動絕大風潮，使全縣教育，陷於糾紛和停頓的狀態。教育界尙且如此，其餘更不必言了。所以我們如果要建設健全的風氣，首先要打破重私輕公的惡習，發揮因公忘私的精神。平心而論，地位的野心，權力的慾望，以及意氣的爭執，那個沒有。要人人完全剷除個人地位、權力，以及意氣的觀念，實在是不能實現的空想。我們現在所要求的，就是個人的地位和權力，平時儘管去營謀，私人的意氣，平日也儘管去爭執，然而一定要有一個限

度。這個限度，便是公家的利益。在不犧牲或影響公家的利益的限度內，個人儘可謀利益，逞意氣；一旦於公家利益有影響，我們就要停止私利的營求或私見的爭執。個人如此，派系也應該如此。我們要在保全或增進公家利益的範圍內，做派系的活動；決不能因派系的活動，而損失公家的利益。爲公忘私，不是絕對做不到的。這種事實，古今中外，不乏其例。曾文正和左文襄，晚年意見，幾同水火，甚至弄到不能見面。然而左文襄征西的時候，曾文正不僅撥其部下的精銳，歸其統率，而且在其兩江總督的任內，對於西征軍的餉糈，源源不絕的接濟，毫不加以掣肘。所以文襄平回之功，得力於文正的援助實多。曾文正不以個人的意氣，坐觀文襄的成敗。這種因公忘私的精神，值得我們佩

服和倣效的。其他如派系之爭，那一國沒有。俄國共產黨的正統派和反對派之爭，幾同水火，且不去說；就是日本軍部內的統制派、正義派和清軍派，以及其海軍中的紅瓦派和艦隊派，也何嘗不是不絕的明爭暗鬥？也何嘗不爭地位、爭權力和爭意氣？然而俄國共產黨，決不因派系之爭，而破壞國內的建設；日本的海陸軍，也決不因派系之爭，而阻撓其對外的侵略。像我國因爭私人意氣，不惜與兵動武，反抗中央；因謀私人利益，不惜認賊作父，賣國求榮；實在是特有的現象。此地還要特別提出說明的，就是犧牲公利，以謀私利，固然是不可容恕的舉動，就是因爭私見而破壞公益，也是不應有的行爲。而這種行爲，所謂士大夫，所謂君子，却很常犯。這些先生，私利可以犧牲，私見却不能放

棄。他們對於某一件事情的主張，最初本來是爲公的，但是一遇到反對者的反對，就意氣用事，不反省自己的主張，是否正當，不問別人的主張，是否有理，而一味排除異己，一意孤行他們的主張。最初雖是爲公，到了後來，就不問是非曲直，專爭感情意氣，而變成一種私見了。這種因爭私見而破壞大局的事，歷史上實不乏其例。前章所述的宋朝的黨爭，就是一個證明。新黨舊黨之爭，最初是爲新政。這種黨爭，可謂政策之爭，不僅無礙，而且有時還是必要。到了後來，就完全離開政策，而爭私見了。新舊黨之爭，還勉強可說是君子與小人之爭。以後舊黨的內訌，就完全不顧大局，妄逞意氣了。所以私見之爭，實在是中國士大夫的傳統的風氣。國可破，家可亡，身可死，而個人的私見，不可以

犧牲。這種風氣，一直傳到現在。我們要曉得：爭私見，雖然沒有爭私利，那樣可鄙可恥，然而因為門戶之見一深，黨同伐異的行爲便起，所以派別間的意氣之爭，其破壞大局，影響公共的利益，却和爭私利是一樣。因此，士大夫不僅應有犧牲私利的精神，而且應有平心靜氣的考量，是非得失，而犧牲私見的雅量！

總而言之：要建設健全的風氣，首先要公而忘私的精神。如果沒有這種精神，小人固誤事，君子也誤事；頹廢固無裨大局，熱烈也無補時艱；浪漫固足以使社會墮落，努力也未必能令國家進步。因為所謂熱烈，所謂努力，不爲私利，即爲私見，社會國家的公共利益，又何能因其熱烈努力，而得到絲毫的好處？

第二，要剷除敷衍、應付和虛偽的風氣，建設忠於所事、忠於職責的精神。缺乏忠的精神，也差不多是傳統的風氣。第一是不忠於所事。小而言之，從辦一個甚麼合作實驗區或義教實驗區起，大而言之，到施行甚麼聯省自治或內閣制、總統制止，不是標新立異，志在宣傳，就是假名號召，另有用意。求其真正忠實於某種事業，某種制度，而必欲使之成功的人，雖然不能說沒有，實在是不可多得。就是有一時忠於所事的，然而總懷着某事一定要自我而成的心理。在自己手上辦，就努力使之成功，以顯自己的能力；在別人手上辦，至少亦觀望其失敗，以示別人的無能，這種人雖然一時熱誠努力，也不能算是忠於事業。因為真正忠於事業的人，只要是自己主張的事，不論是自已親辦，或

別人在辦，都應該直接間接，加以努力，而使之完成的。在第一章內曾經說過，幾十年來，外國的辦法或制度，都一套一套的搬來試驗過，都一套一套的失敗了。失敗的原因，不完全是辦法或制度的本身不好，也不完全是他們不適合中國的情形，實在是因爲他們沒有真正的被試行過。這些話，我們在此地可以重行提起，所謂沒有真正的試行過，就是試行這些制度或辦法的人，沒有忠於他們所行的制度或辦法。這便是對於事的敷衍，應付和虛僞。第二是不忠於職責，這不僅是行政機關的人員如此，就是各社會團體的份子，也莫不然。就社會團體說，許多團體的領袖和職員，不僅不努力的去完成其應盡的責任，而且有許多徒擁虛名，根本不知責任爲何事。就行政機關說，不是敷衍

行故事，就是應付公文。切切實實的奉行法令的，認為是初出茅廬，沒有經驗的幼稚份子；舞文弄墨，推諉拖延的，認為是老成幹練的能吏。例如奉到上級機關的一個命令，辦得通的，固然呈覆遵辦，明知辦不通的，也照樣的呈覆遵辦，很少有對於辦不通的命令，老老實實申述辦不通的理由，呈請變更辦法，以便實在能行的。偶然有所謂幼稚份子，忠實的申述，表示難辦，一定也會碰到上面的釘子。明知辦不通的事情，而曰遵辦，其結果當然就是不辦。但是上級機關，却也不問下面是否實在在辦，只要公文上呈覆遵辦，也就心滿意足了。上下互相敷衍，互相應付，結果完全是虛偽。我們要曉得辦得通的，不去遵辦，固然是不忠於職責；明知辦不通而呈報遵辦，又何嘗是忠於職責？不督促

下級機關切實奉行命令，固然是不忠於職責；遇到下級機關申述困難理由，請求變通辦法，以期實行的時候，不替他們解除困難，求其能行，只責其公文上，形式上，呈報遵辦，而不問其實際是否真辦，又何嘗是忠於職責？至於完全以混飯吃或做官爲目的，根本沒有職責觀念的人，那更是到處都是了。我常以爲我們不必反對某人某派，包辦某事，只求其包了之後，忠於其所包之事而去辦；不必反對某人某派爭權力或地位，只求其爭得了權力或地位之後，能忠實的去完成其權力和地位所賦與他們的職責。無奈一般的現象，只是包而不辦，爭權力地位而不盡其職責。這種不忠於職責的風氣，不剷除，就是衙署林立，官吏成羣，也不過徒耗國幣，百事莫舉；就有一二領袖熱誠奮發，勵

精圖治，事實上也是無法推動的。

我常以爲要復興民族，有一個極簡單的辦法。就是四萬萬人無論爲農、爲工、爲士、爲商，各人都盡應盡的責任。只要這點做到，民族復興，是沒有甚麼困難的。尤其是知識份子，如果從鄉鎮長和小學教員起，到最高級的當局止，個個都能盡其所負的責任，中國民族的復興，確有絕對的把握。這個簡單的辦法，說難固然也難，說易實在也易。爲甚麼說難？因爲如果不難，何以這樣簡單的事情，現在並不能做到。爲甚麼說易？因爲責人以所不能，才算是難，責人以各盡其責，絕對不是苛求，乃是當然應有的事。要一個小學教員，盡小學教員的責任，要一個外交部長，盡外交部長的責任，並不是責人以不能，怎麼能說是苛

求？怎麼能說是不易？小學教員，如果認盡其職責爲難，就不應該做小學教員；外交部長，如果認盡其責任爲難，就不要做外交部長。問題是在是否有鞠躬盡瘁，效忠於其職責的精神。如果有了這種忠於職責的精神，就自然不會以完成其職責爲不易的。所以我們以後要設法樹立一種風氣，使每個人，對其從事的事業，對其擔負的任務，絲毫不玩忽，絲毫不弛懈，絲毫不敷衍，絲毫不趨避，時時刻刻用其心思，竭其才力，去切切實實的執行。據說胡文忠圍安慶時，某日策馬登城外一山，俯視城內，非常快樂，以爲『賊不足平也』。復馳馬到江邊，看見兩隻輪船鼓輪西上，疾如飄風，感覺到外力可畏，忽神色大變，馳馬回營，中途吐血，後竟因此喪身。胡文忠看見輪船，就聯想到西力東漸的厲害，

就聯想到中國前途的危險，就聯想到他的責任的重大，因此急得吐血，急得因吐血而死。這種忠於國家，忠於職責的精神，實在值得我們欽仰和模倣的。胡文忠一班人，有了這種忠於職責的精神，所以才能替清室創立中興的局面。我們現在要中興中華民族，那裏能缺乏這種精神？因此，樹立效忠的風氣，也是我們必須注意和努力的。

第三，要剷除互相推諉，互相責難的風氣，養成任勞、任難、任怨、任咎的精神。做事和處世，有繁劇的時候，有困難的時候，有時會得罪人，有時且會失敗。最要緊的，就是：無論什麼繁劇或困難的事情，不要往別人身上推卸，在自己應該負責的範圍以內，就要挺起身來自己負責；假使有時因負責而招人埋怨，也不必怪人家對自己不諒解；甚或

有時失敗，也應坦白自承，不應責備別人的破壞，或不協助。但是現在的情形，完全不是這樣。第一，地位是要的，權力也是要的，說到做事，上級的人，只圖自己舒適安閒，遇事責成下級；下級的人員，如果能往別人身上推卸，也盡量推卸；萬一推卸不了，也要等上面推一下才動一下，不推就不動。很少有上級的人員，躬親庶務，而不往下級推；也很少，有下級人員，能自動的找事做，而不必等上級的命令或督促。這幾年來，雖然因為最高領袖的苦幹，各級幹部也較緊張，然而勤勞的風氣，仍然沒有普遍的樹立。政府機關如此，一般社會何莫不然。遇到鄰里鄉黨間有事故發生，或者社會上有公益事情要做，大概都是你推我諉，此辭彼卸，很少有見義勇為，身任其勞的。這還是就普通事件而論。

如果遇到稍感困難，或稍爲危險的事情，那就更加避之唯恐不及，不僅無意識的希望別人承擔，且意識的企圖推卸於別人了。除却一般所謂少不更事的以外，稍有歷練的人，很少有自動負責，身任其難的，這種不任勞，不任難的情形，已成爲目前一般的風氣。第二，即使也有既肯任勞，又肯任難的人，然而很少有肯爲公事而招人怨恨，更少有遇着失敗，而自願負責的。關於前一點，以前也曾有人說：『任天下之事易，任天下之怨難。』現在更常常聽見人說：『要我任勞固不辭，要我任難也可以，但是任勞任難的結果，至少精神上，要得到報酬，如果忠心熱腸的任勞任難，反落得別人的怨嫉，社會的毀謗，未免太不合算。』這種心理，我相信，是很普遍的。有了這種心理，無論關於政令的

執行，事業的設施或改進，以及政策的決定，都難免徘徊瞻望，多所顧忌。假使執行政令而不遭怨，當然沒有問題；萬一有因此招怨的可能，寧肯枉法徇情，以免怨尤。又如一種事業的設施或改進，如果順利進行，自然沒有問題；假使會因此而成爲衆矢之的，就會不顧事業之是否正當，而停止進行了。至於因不健全的輿論的指摘，而影響到政策的決定，也是常有的事實。這些現象，都是從不肯任怨的心理而來的。關於後的一點，事實也就不少。無論甚麼事情，假使不能成功，總是責備別人，毫不反求諸己。例如軍事，如果打敗了仗，不是怪友軍不協同動作，就是怪後方的援兵或接濟不足。究竟是否是因自己佈置不周密，或應付不沈着而失敗，完全不去追究。又如辦一個學校，如果學校

的學風敗壞，學生的程度不好；不是怪教員不肯努力，就是怪官廳不肯增加經費。究竟是否自己領導無方，全不去研究。總而言之：過錯都是別人的。彼怪此，此怨彼，此說彼掣肘，彼說此阻礙。這種情形，也成爲一種風氣。不肯任怨，論情還覺可原。像這樣不肯任咎，而諉過於人，實在是不能容恕的卑劣的心理。

在這種互相推諉，互相責難的風氣中間，我們要立刻養成任勞任難，任怨，任咎的精神。第一在國際競爭這樣劇烈的時候，無論在政治上、軍事上、經濟上、文化上，我們都要以十二分的努力，勇猛前進。況且我們事事落後，一定要急起直追，才有趕得上的希望。如果只是人家前進一步，我們也前進一步，在本身前後比較，雖然覺得進步，然而

如果和別人比較，終究是望塵莫及。假使人家前進一步，我們連一步也不能前進，那就要愈落愈後，愈追愈遠了。所以別人前進一步，我們至少要前進兩步，才趕得及。而要能達到這個目的，至少要一個人負兩個人的責，一點鐘做兩點鐘的事，那裏還容許我們有偷閑躲懶的餘豫。如果公務員坐在辦公廳裏，像俗所謂掛掛號，看看報，抽抽烟，談談天，成日價無事可作；如果社會上的人，一天到晚上茶館，提雀籠，以遊蕩度日，而不務正業；我敢相信我們的前途，是沒有希望的。晉人好清談，宋人多空論的結果，已給我們以悲慘的教訓了。所以我們要養成一種緊張勤勞的風氣，不僅要使政府中沒有冗吏閒員的存在，而且要社會上沒有遊手好閒的國民。如果全國上下，除掉飲食休息所

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時間以外，個個人都以所有的精力，所有的時間，直接間接替替社會國家做事，雖然不敢說一個人的力量，可以做兩個人的事，至少一個人總可以當一個人用，不像現在這樣踈懶懈怠了。不過勤勞，第一，須用於有益的事業，第二，須有正當的方法。否則，不僅事倍功半，甚且會徒勞無功。例如一日到晚，跑到東開會，跑到西開會，而所討論的盡是空談，所議決的，盡未見實行，就是日夜不休息的勞力，國家社會也不會因為這種勤勞，而得到絲毫的利益。又如一個領袖，不提綱挈領的做籠照全體的工作，而朝夕忙碌於瑣屑細故，他的許多努力，一定也會完全浪費。不過這些都是方法問題，我們在此地不能詳細的陳述意見了。第二，畏難苟安，或已任其易，而令人處其難，

也是應該立刻剷除的風氣。世界上絕對沒有完全沒有困難的事情。大事有大困難，小事有小困難。尤其是在中國現在這樣人民知識幼稚，社會經濟困窮，公私道德墮落，朝野議論紛紜，國際壓迫嚴重的時候，要做一件積極的改革或建設的事情，一定到處都是阻力和障礙。我們一定要以百折不撓的精神，去克服這些困難，萬不能看見荆棘當前，就畏而却步，尤其不要存着希望別人的心理。假使你畏難，我也畏難，你望我，我也望你，困苦艱難的事業，還有那個來擔負！這個粗淺的道理，當然是人人都懂得的。所以大家要養成以艱難自任的勇氣和毅力，然後才能齊心協力的做成移山填海的艱巨事業。第三，在一般知識低下的社會裏面，要以高瞻遠矚的眼光，建立不爲世俗所了

解的遠大的大計；在自私自利的空氣中間，要以公衆的福利爲前提，做妨礙甚至於犧牲少數人的私利的事業，自然要遭流俗和私人的怨恨。例如要修築馬路，自然難免房屋被撤的人民的咀咒；要興辦電車，自然難免以拉車爲業的車夫的反對；要裁汰冗員，自然難免失職人員的怨懟；要執法無私，自然難免因緣爲奸的滑吏的痛惡。諸如此類，舉不勝舉。韓非子說：『今上急耕田墾草，以厚民產也，而以上爲酷；修刑重罰，以爲禁邪也，而以上爲嚴；徵賦田粟，以實倉庫，且以救飢饉，備軍旅也，而以上爲貪；併力疾鬥，以禽虜也，而以上爲暴；此四者，所以治安，而民不之悅也。』又道：『昔禹決江濬河，而民聚瓦石；子產開畝植桑，鄭人謗訾；禹利天下，子產存鄭，皆以受謗。』可見得替天下國家

任事，招人怨謗，乃是當然的事了。我們一定要以堅強的意志，偉大的氣魄，甘受目前少數人的怨恨，而爲久遠的，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奮鬥。歷史上有作有爲的人物，沒有不具任怨的精神的。韓非子所舉的大禹和子產，便是很好的例。我們再看一看王荊公和張江陵的態度，更足以令人感奮。荊公勵行新政的時候，反對者罵他是『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畏』。殊不知『人言不足畏』正是荊公任怨的精神充分表現。他的新政的利益，爲迂儒俗吏所不了解，而招迂儒俗吏的毀謗；新政施行，多不利於豪強巨室，又受豪強巨室的怨恨；如果他以人言爲可畏，那就一事不能舉辦了。所以他以爲只要是非看得準，利害認得清，得失辨得明，就要以雷厲風行之勢，貫徹自己的主張，絕不以人

言爲可畏了。張江陵所處之境，也非常人所能應付。他嚴教君主，君主怨他；制馭宦官，宦官怨他；裁抑貴戚，貴戚怨他；嚴課官吏，官吏怨他；懲辦言官，言官怨他；淘汰生員，生員怨他；壓抑豪右，豪右怨他。然而他認定君主須嚴教，宦官須制馭，貴族須裁抑，官吏須嚴課，言官須懲辦，生員須淘汰，豪右須壓抑，他就不顧四方八面的怨氣衝天，而以一身任之而不辭。他認清『利於公者不利於私，怨讎之興，理所必有。』所以他『願以身爲蓐薦，使人寢處其上，洩溺之，而無間焉。有欲割取耳鼻，亦歡喜施與，况詆毀而已乎。』兩公的這種任怨的精神，在我們現在徇情取巧認爲當然的社會裏面，實在應該立即效法養成，而樹爲一般的風氣。第四，功則歸己，過則歸人，在以成敗論人的俗見盛行的時

候，常成一般的風氣，也是難怪的事實。不過一件事的不成功，甚至於慘敗，一定有他的原因。一定要明瞭他的原因，才能定捲土重來的計劃，才不致蹈已往的覆轍，重陷於失敗的命運。但是要明瞭他的原因，一定要決定他責任的誰屬。如果一件事情失敗，主持和參與的人，都彼此互相責難，互相推卸，究竟失敗的真正原因是甚麼，是無法探究的。而且最初就存一個委過於人的心理，自然就不會十分負責，十分努力，而下務必使這件事情成功的決心。所以我們一定要人人有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氣魄。無論是事前或事後，都以身當其衝，身任其咎。事前如有這種氣魄，自然就會毫不推諉，毫不觀望，以全力負全責，勇猛精進，以期卒底於成。假使事敗後，而有這種氣魄，如果事尚可為，自

然就會帶罪圖功，萬一絕望，也會引咎自裁。不能帶罪圖功，便當引咎自裁，這是任事的人失敗時所應有的態度。諉咎於人，而置身事外，是最卑怯的行爲。頃讀日本維新前歷史，文化五年（一八〇八年）英國飛登號戰艦，以搜捕荷蘭船爲名，突入長崎。明知荷船不在，而搜索全港，更遣人致書鎮守使松平康英，以焚燒港內一切船舶相脅，而勒令其供給薪水食物。其時長崎僅有警衛百名，筑前、大村兩藩的軍隊，又難於調動。不得已只有屈服遵辦。英輪去後，松平康英也不假口兵力單薄，也不推咎於鄰藩的坐視不救，而以有損國威自咎，自殺於鎮守所。以謝幕府和國人。不久肥前藩大夫崛豐前等數名，也都引咎自裁。像這樣悲壯的行爲，我們中國歷史上，也有不少的記載。可惜這種精神，

現在喪失了。我們一定要恢復這種精神，以應付空前未有的國難。

總而言之，任勞、任難、任怨、任咎的精神在互相推諉，互相責難成爲一般風氣的現在，乃是起死回生的聖藥！

第四，要剷除冷淡的心理，養成狂熱的風氣。無論那一件偉大艱難的事業，尤其是一種羣衆運動，一定要參加這種運動的人，個個有獻身的精神。不論成敗，不計得失，以全部的聰明才力，血肉靈魂作代價，而追求所理想的目標。一定要個個人有這種精神，一種羣衆運動，才可以向前推動。然而要人人有這種獻身的精神，一定要人人先有狂熱的情緒。在狂熱的風氣中間，弱者也自然的不會退縮，而隨着大家前進，私人也自然的會放棄私利私益，而不能不逼着爲公共而犧

牲。所以歷史上許多悲壯的可歌可泣的運動，都是由狂熱的風氣所推動的。十字軍時代的遠征軍，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。前仆後繼的失敗一次，再來一次。我們讀當時歷史的人，猶且爲這種風氣所感動，恍如置身當時，奮然思起，何況身歷其境的人。狂熱的力量偉大，於此就可知道了。就是我們辛亥的革命，和十五年的北伐，也何嘗不是爲狂熱的力量所推動，在狂熱的風氣中所完成的？可惜這種狂熱的力量，逐漸磨滅了；這種狂熱的風氣，逐漸消散了。遠的不必說，在這幾年中，黨外只聽見傍觀式的冷嘲，而沒有狂熱的表現；黨內，如果不是最高領袖在那裏以全力來鞭策督促，恐怕也要死氣沉沉，奄奄一息了。默察現在一般的情形，不獨對於領袖，減少了狂熱的擁護，就是對於

主義，也差不多完全失去了狂熱的信仰。這幾年來，因為天災人禍，內憂外患，交相逼迫。因此這幾年的工作，多在消極方面，消滅主義實現的障礙，掃除藉黨營私份子，而沒有餘力充分的去完成主義的建設。這原是革命過程中必有的現象。用不着悲觀，更用不着失望。我們只要看一看法國自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後，再經過幾次革命，再經過多少年月，共和制度才能確立，就可以不必自餒了。不幸現在的情形，不僅黨外對於三民主義，嘗聞不懷好意的指摘，就是黨內的同志，也多以宣傳三民主義為難為情了。黨外的指摘情尚可原，同志失去了對主義的信仰，失去了對主義的狂熱，那便是黨的自殺，也就是民族的自殺了。再看對於領袖的態度。所謂擁護領袖，不僅要當面服從，最

要緊的是背後服從；不僅要尊重他的身分，尤其是要尊重他的主張。但是實際情形却不盡然。有許多人，在領袖面前，十分的恭恭敬敬，唯唯諾諾，但是一到背後，不單是沒有恭敬之心，甚至於因爲所求不遂，表示埋怨；且有於談話之間，直呼其姓名。（這一點，我個人覺得非常重要。所以每次聽見下層同志直呼領袖的姓名，或下級人員直呼上級長官的姓名，常加以斥責。我們雖然不必像德國一樣，以希特勒萬歲代早安；也不必學『父母之名，耳可得而聞，口不可得而言』的中國古訓。但是幹部對領袖，學生對師長，下級對上級，就是在背後，也應該附以先生或其他的銜名，而不可以竟呼其姓名。此事無關本文，姑不詳述。）至於領袖所訓勉的話，當面雖然一一接受，背後能一一遵從的，實在也不多。我覺得對於領袖的訓示，可以『面折廷諍』，絕不可陽奉陰違。

領袖如有疎忽或錯誤，假使陳述意見，甚至『犯顏直諫』，以補充其不足，糾正其錯失，却是擁護領袖的正當的態度。直諫而有效，自然很好；萬一不聽，只得另想別法以謀救濟，對於命令，仍須奉行。假使當面不加可否，盡量表示奉命承意，退後則批評議論，甚至陰不奉行，那便是對於事業爲不忠，對於領袖爲不信。可惜這種不忠不信的情形，却是常見的事實。無論機關或地方，領袖不在，則盡廢弛散漫之能事，只要領袖一到，立刻變成緊張嚴飭；一旦領袖離開，立刻又恢復廢弛散漫的故態。像這樣當面服從，背後不服從的態度，我們決不能承認是對於領袖的狂熱的擁護。再有一些人，雖然號稱擁護領袖，而不擁護領袖的主張。一種主張，於某人或某一部分人有利，這個人或這一部

分人就盡力擁護，而且努力進行，以求其實現；反過來看假使這種主張，於某人或某一部分人不利，這個人或這一部分人，雖然平日也是同樣的擁護領袖，然而對於這個主張，雖然不致明目張膽的反對，至少也是陽奉陰違，處以冷淡，甚或希望其主張的失敗。這種擁護的態度，完全是在私人的利害上打算盤，那裏說得上狂熱？一般幹部，乃至全體黨員，全國民衆，大家都這樣冷淡、虛偽、計較私利，一二領袖，無論怎樣賢明，怎樣公忠，怎樣努力，這一部腐朽的機器，如何能推得動？

得某人說：『拿破崙曠世之名將也，苟授以綠旗之惰兵，則不能敵黑蠻；哥倫布航海之大家也，苟乘以朽木之膠船，則不能渡溪沚。』實在是很正確的道理。我們徒羨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轟轟烈烈的功

績，而希望中國也產生一個墨索里尼或希特勒。而不知墨希兩氏，完全是意德兩國狂熱的國民所培植，所養成。在中國這樣冷淡的社會裏面，即使有具備墨希兩氏的素質的領袖，絕不容易得到他們那樣的成就。鮮美的花，那裏能在瘠地上面發榮滋長？所以我們如果希望主義實現，和領袖成功，一定要養成一種狂熱的風氣，無論對於主義或領袖，都以狂熱的精神，狂熱的行動，去擁護和實行。有了這種狂熱做動力，就自然不會浪漫，不會萎靡，不會頹廢，不會放縱享樂了。而一部複雜的機器，也才能因這個動力的發動，各部分同時動作起來。前面曾經說過，在辛亥革命和十五年北伐的兩期，也曾表現過狂熱的風氣，不過不久即行消失了。所以我們今後不單是要努力於狂熱風

氣的養成，而且須努力於他的持久。要狂熱的風氣持久，必須對於主義有類似迷信的信仰，對於領袖有類似盲從的服從。迷信和盲從，可以產生偉大的力量。這個力量，一方面可以產生狂熱的情緒，一方面也可以維持狂熱的風氣。如果個個人都事事須考慮，時時要計算，根本就不能產生狂熱的精神，當然說不上持久。在這個意義上，我是主張在一種羣衆運動中，尤其是在民族復興這個艱巨的運動中，我們要提倡對於主義和領袖，應該迷信和盲從。

第五，剷除個人自由的風氣，養成嚴守紀律的精神。現在不僅黨外的一部份知識份子，反對統制，甚至於反對嚴格的紀律，而主張個人的自由，就是在黨內同志之中，雖然沒有明白的主張，而個人自由

的潛意識，也有絕大的勢力。主張個人自由的理由，以爲文化，是要進步的；而要文化進步，必須有比較競爭和個性發展。各人的天職有不同，因之，才能興趣和志向，亦各有異。如果各個人都有應着自己的才能興趣和志向，自由發展的機會，絲毫不受束縛，就會因爲個性發展，而有比較競爭；有比較競爭，然後文化才能進步。如果鑄成一個模型，把各個人的思想，言論信仰和行動，都歸納到這個模型以內，那便是文化的死滅。所以他們以爲春秋戰國時代，學術之所以發達，是因爲當時的思想自由。自從秦始皇焚書以後，又繼之漢武帝的尊崇六經，以統一思想，於是中國的學術，便從此停滯了。因此，他們反對統制和紀律，而主張自由。這種主張，雖然也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然而因此就

主張個人自由，絕對不能限制和束縛，未免沒有看清時代的需要。這樣主張，是不合乎時代的需要的。思想自由與學術關係，究竟怎樣？乃至個人自由與一般文化的關係，究竟怎樣？現在且不必去研究。我們應該先問中國目前最切迫需要的是甚麼？不切實際的學術，乃至一般文化的發達，在中國目前，乃是次要，而非切要。目前所切要的，乃是民族最低限度的生存，如何能得到保障；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，如何能得到滿足。換句話說：目前切迫的需要，是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。這兩種建設所需要的，是自然科學的技術，而不是談哲理，講原則的空論式的學術。而運用自然科學的技術，以推動這兩種建設，却需要絕大的力。因為不僅是消極方面，橫在這兩種建設前面的種種阻礙和

難關，需要絕大的力去衝破，就是積極方面，兩種建設的進行和完成，也需要絕大的力去發動。這個力量的構成，就不能不限制或束縛個人自由為代價了。因為要形成舉國一致的力量，就要統一意志和行動。假使意志和行動，不能統一，全國四萬萬人，各人有各人的主意，各人有各人的行動，有些人主張，有些人主張，一部分人主張以農立國，一部分人主張以工立國，在這樣意見紛歧，行動異趣的狀態之下，不單是不能形成整個的力量，而且因為互相衝突，互相抵消，各個的力量，也就不能發揮效用。所以一定要在統一的意志之下，舉國一致的共同動作，向一個目標前進，這個目標，才能達到。然而要統一意志，就不能不限制個人的思想自由；要統一行動，就不能不限制個人的行

爲自由了。所以在民族掙扎圖存的生死關頭，看清當前的需要，決定鬥爭的路線，鑄成一個模型，把全國人的意志和行動，都歸納到這個模型之中，不許有和這個模型相衝突的思想和行動，乃是不可逃免的事情。在這個意義上，限制或束縛個人的自由，絕對不是壞的事情，萬一就認爲是壞事，也是一種必要的壞事（Necessary evil）。認清這一點，就可知政府爲民族爭生存，有限制個人自由的權利；個人爲民族爭生存，也有犧牲個人自由的義務。在這個嚴重的時期，還要拾十八世紀自由主義派的唾餘，而高唱個人自由；雖然不敢說是知識份子爲個人謀便利，至少也可說是不識時務了。自由的反面便是紀律。紀律，便是統一意志和行動的工具，也就是限制或束縛個人自由的

工具。黨員如能遵守黨的紀律，人民如能遵守政府的紀律，我們的力量，就可以集中，而發揮偉大的效用。德意和蘇俄，對內對外，都能表現偉大的力量，就是因他們的黨員乃至一般國民，都有犧牲個人自由，遵守紀律的精神。軍隊之所以有絕大的威力，也是紀律的效用。我們主張人民軍隊化，不一定要個個人去當兵，個個人能放鎗，乃是要個個人能和軍人一樣嚴格遵守紀律。一盤散沙似的中國人，如果不能以紀律來團結，假定就能人自爲戰，也不能抵抗侵略的整個的力量。所以養成犧牲個人自由，遵守團體紀律的風氣，也是精神建設的一個重要目標。

第六，要剷除卑鄙貪污的惡習，樹立尚名節重廉恥的風氣。我們

根據第二章所述歷史的事蹟，可知卑鄙貪污的惡習，具有腐蝕政治的絕大力量，乃是一個朝代，甚至一個國家衰亡的重要原因。就對內言：有了卑鄙的惡習，大家就徒以苟悅取容，作倖幸之階，甚且學蛙鳴犬吠以媚上，作奴顏婢膝以悅主。既然以取媚爲利達的捷徑，自然一方面就以所媚者之是非爲是非，所媚者之曲直爲曲直，使社會上無真正的是非之分，曲直之別。一方面就因爲只顧趨候逢迎，而置所負之責，所任之事於不顧，以致百事俱廢弛莫舉了。有了貪污的惡習，不僅要不顧人民死活，以剝削民財爲能，而且要不顧公家損失，以侵吞公款爲事，不惜弁髦法令，以賄賂爲常了。在這樣剝削、侵吞、賄賂、廢弛，而又是非不明，曲直不分的風氣中，政治怎麼不腐敗？所以卑鄙貪污

的惡習，腐蝕政治的力量，實在非常的大。就對外言，卑鄙貪污，既然相習成風，那裏還能慷慨赴義，從容就死？所以不僅在國內戰爭的時候，可以朝秦暮楚，今日事甲主，明日事乙君。就是非我族類，只要誘之以利祿，餌之以地位，也可以爲虎作倀，認賊作父了。我們只要看一看歷史上異族入主中國的時候，不僅沒有一次沒有神明華胄，爲他們佐命立功，而且有多少前朝遺臣，以不能攀龍附鳳爲恨。就可知卑鄙貪污的風氣，怎樣足以滅亡國家了。不幸我們現在的政治和社會，還充滿這種風氣。趨候逢迎，剝削侵吞，賄賂廢弛等現象，比之軍閥政治的時代雖然減少得多，然而仍舊沒有根絕。至於爲異族作鷹犬，替敵人做爪牙的人，更日見其多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如果還不極力提倡名節，

砥礪廉恥，不必人家的堅甲利兵，我們也會自趨於滅亡。不過要尙名節，重廉恥，不能完全希望個個人都自覺的良心發現，自動的改變行爲。一定要蔚成一種風氣，使人人在這個風氣中間不能貪污，不容卑鄙，然後自然的會知尙名節，知重廉恥了。因爲我們常常看見一些人以諂諛逢迎等卑下的手段去獵官，以侵吞賄賂等貪污的方法去發財，就覺得這些人爲可鄙可恥；其實平心而論，他們固然可鄙可恥，而其所以驅人幹這種可鄙可恥的勾當的，却是風氣。歷來世俗一般的風氣，只是羨慕崇拜尊敬居高位，享厚祿的人，認爲他們是聰明能幹，有作有爲；而對於潔身自好，不事鑽營，因而不能聞達的人，則加以白眼，以爲是沒有出息的東西。至於居高位，享厚祿的人的高位厚祿，是

以甚麼手段得來的，則全不過問；不能聞達的人之所以不能聞達的原因，也全不去推求。因之寡廉鮮恥的人，遂爲世俗所推崇，而硜硜以名節自守的人，却爲世俗所輕視。苟非有超人的眼光和氣魄的人，那裏能打破世俗毀譽的觀念？而這種人無論在甚麼時代，在甚麼社會，都是很少數的。於是大多數的人，因爲要免去世俗的白眼，而得到世俗的崇拜，就不知不覺，自然而然的，羣趨於卑鄙貪污，寡廉鮮恥之途了。所以要矯正這種現象，不應只是責備某一個人卑鄙，某一個人貪污，某一個人寡廉鮮恥，一定要使一般社會，養成一種賤利祿，尙名節，輕富貴，重廉恥的風氣，然後個人的貪污卑鄙的行爲，才不易發生。不過在政治上或社會上站在領袖地位的人，却不應假口於風氣的不

良以掩飾自己的不正行爲。領袖人才，一定要自己有『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』的精神，以爲倡導，然後尙名節、重廉恥的風氣，才能夠蔚成。

精神建設的偉大運動，如果能夠向着上述的六大目標猛勇的切實的前進，而使其完全實現，我們目前凋弊的風氣，一定可以健全起來。不待說，上述六大目標，未免掛一漏萬，其餘項目，一定還很多。不過這六個目標，乃是最根本的。只要這六個根本的目標能夠建設起來，其餘附帶的枝節現象，都可以隨之而變的。虛浮、狡詐、怯懦、頹廢、浪漫、奢侈、淫縱、唱高調，以及處世的明哲保身，作事的通融辦理，都是應該矯正的風氣。然而不必一一細舉。我相信只要六個根本的目標完

全實現，則虛浮也可以變樸質，狡詐也可以變誠信，頹廢的也會振作，怯懦的也會勇敢，浪漫的也會嚴肅，奢侈的也會儉約，淫縱的也會檢束，唱高調的也會顧及事實，而明哲保身，也自會變為殺身成仁，通融辦理，也自會變為嚴守法令了。其中的理由，不必詳述，我們只要稍一研究，上述六項目標和這些附帶現象之間的關係，就可以明白了。

第五章

精神建設的原則和方案

一個時代的風氣和當時國運盛衰的關係，我們已知道了。要挽救中國的危亡，根本的工作，是要剷除凋弊的風氣，另樹立一種健全的風氣，我們也知道了。要樹立一種健全的風氣，應該建設那幾種具體的目標，我們也知道了。剩下的問題，就是這種健全的風氣，用甚麼方法，才能樹立起來？換句話說，上述精神建設的六大目標，要用甚麼

方法才能夠一一實現？這個問題，實在是非常緊要的。因為這個問題，如果得不到相當的解決，我們雖然希望樹立健全的風氣，也不過終於希望，我們理想的精神建設，也不過終於理想，而上面的千言萬語，也都是白說的廢話了。所以這本小冊子，如果沒有最後的一章來解答這個問題，就和畫龍沒有點睛一樣，儘管龍怎樣畫得好，沒有點睛，就不會生動。

在解答這個問題之前，我們先要明白精神建設，是一件極困難的事。他的困難，遠超過物質建設的困難。物質建設，當然也有不少的困難，然而這種困難，是有形的，是具體的。有形的阻礙，可以拿有形的力量去打破；具體的難題，可以拿具體的辦法來解決。譬如要建築一

條鐵路，或是遇着高山塞途，或是遇着大河當道，或者人民反對徵地，或者建設材料不易運輸，這些都是困難。然而這種困難，比較容易解決。高山大河等有形的阻礙，可以拿開山洞，建鐵橋等有形的力量去打破；人民反對運輸不便等具體的難題，可以拿給價增價，或開關輕便鐵路等具體的辦法來解決。但是精神建設就不同了。精神建設，是要改造一般人的心，是要把一般人的壞心變成好心。心，是無形的，是幽渺的，是微妙的，是變化不測的，是不易捉摸的，要改造具備這些特質的心，實在不容易想出具體的辦法。古人說：『去山中賊易，去心中賊難。』我們要去自己心中的賊，尚且不易，如果要我們拿出辦法去，去別人心中，當然是更難了。我們要改造自己一個人的心，尚且

不易，要拿出辦法，去改造一般人的心，當然是更加不易了。所以我以為精神建設，其困難遠過於物質建設。不過困難雖然困難，也不是絕對沒有辦法。以下提出的幾個方案，如果能夠切實做去，而且持之以恆，我相信是可以發生效力的。

在提出具體方案之前，先要說明這些方案所根據的原則。要完成精神建設，不外兩個原則：一是自動的，一是被動的。所謂自動的，就是各個人自己的內心的自覺。詳細說，就是各個人或者因為修養功深，自行參透，或者忽然心血來潮，天良發現，於是懺悔過去的不對，另行建設一種新的人生觀，好像以前種種，譬如昨日死，以後種種，譬如今日生。這種自動的精神建設，假定叫做主觀的革新。所謂被動的，就

是受了外界的刺激，反應的促起了內心的變化。這種情形，又可以細分爲兩類：一是受了外界感化或感動，潛移默化的自然的發生了精神變動；二是受了外力的誘導或強迫，起初不自然的發生了精神變動，久後也習慣成爲自然的狀態。一個人精神的變動，或心理的改革，總不外上述的三種情形。所以我們要完成心理建設，當然要根據這三種情形，決定許多不同的方案，同時分頭並進。不過就我個人的意見，自動的和被動的兩個原則之中，我們應該注重被動的原則。而在被動的原則之中，我們又要注重以外力來誘導和強迫。因爲：第一，主觀的革心或內心的自覺，除是聖賢豪傑或先知先覺的人，才可以做得到。如以此期望一般的人，那是絕對不容易實現的。假使一般的人，

都這樣容易自覺，一般的風氣，也就不會敗壞到足以使國家滅亡的程度，而需要改變了。如果希望貪污的人，良心發現，變為廉潔；希望自私自利的人，自動的覺悟，公而忘私；那都是要令你失望的空想。所以主觀的革新，或內心的自覺，只可以期諸少數的領袖，而不能做精神建設的普遍的方案。第二，在被動的原則中間，如果用外界的感動或感化，去促起個人內心的改革，自然比坐着不動，希望人家自覺的辦法，要有效得多。人類是理智的動物，同時也是感情的動物，因為人類有理智，所以拿道理去解說，可以使人感化；因為人類有感情，所以拿情感去勸喻，也可以使人感動。所以拿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，去大聲疾呼的宣傳，可以感動許多冷淡的人熱烈；拿名節操守的道理，去苦

口婆心的規勸，也未嘗不可以感化貪污的人廉潔，無恥的人自愛。因此，這種感化或感動的辦法，是有效的。我們在精神建設的運動中，是要採取這個辦法的。不過比這個更要有效的辦法，就是以外力來誘導和強迫。因為感動或感化，固然也可以生效，然而假使人家不受感動和變化，你再有甚麼辦法？儘管你大聲疾呼的宣傳，而冷淡的仍舊冷淡，決不受你的感動而熱烈，你將奈他何？儘管你苦口婆心的規勸，而貪污的仍舊貪污，無恥的仍舊無恥，決不受你的感化，而廉潔自愛，你又將如之何？既然都無如之何，那末，感動和感化的效力，也就有時而窮了。再就我們要感動或感化的人來說：他們受了感動或感化，在他們自己本身，有甚麼直接好處？不受感動或感化，在他們自己本身，

有甚麼直接害處？例如販賣仇貨的好商，在他們看來，受了感動而不賣，於自己無益，不受感動而仍賣，於自己也無害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他們就不一定會受感動或感化了。所以感動和感化的辦法，固然有時生效，有時也不能生效。感動和感化不能生效的時候，我們就要用誘導和強迫的方法來補不足了。這個方法，我主張要採用儒家所不贊成的『導之以政，齊之以刑』了。其實孔子也曾說過：『聖人之治化也，必刑政相參焉，……化之弗變，導之弗從，傷義以敗俗，於是乎用刑矣。』以政刑來完成精神建設，我覺得是我們必須遵守的重要原則。因為在這個原則之下，如果貪污的『化之弗變』而仍舊貪污，無恥的『導之弗從』而仍舊無恥，對於他們，就『於是乎用刑矣。』在他

們方面設想，因為要免去『用刑』也就不能不受化而變，受導而從了。所以這種強迫的力量，以之施於一般的人，比感動感化的效力要大，大比坐着等其自覺的效力要更大了。因此我於注重被動的原則之外，更注重被動原則中的誘導和強迫的辦法。

根據上面的原則，我提議下列的幾個方案。

第一，領袖人物，要根據精神建設的目標，『以身作則』。『以身作則』，是比甚麼辦法還要緊的一個辦法；也可以說這個辦法，是其餘別的辦法的先決條件。領袖人物能夠以身作則，其餘的辦法才能行之有效；如果以身作則這個先決問題，沒有得到完滿的解決，其餘的辦法，是不會生效的。這個理由很明顯：從消極方面說，無論是要一般人

有所爲或有所不爲，必定要從領導者自己先做起，然後一般人才能心悅誠服的聽從。如果不然，被領導的人，只要反問一句：『你自己爲甚麼不這樣？』就可以把我們一切勉勵或強迫的話，完全打消。例如要人有所不爲，詳細說，要人不貪污，不虛僞，不奢侈，不頹廢，當然要我們自己能夠不貪污，不虛僞，不奢侈，不頹廢，然後我們所說的話，才有力量。如果自己貪污，而責人以不貪污，自己頹廢，而責人以不頹廢，人家那裏會聽從我們的話？又例如要人有所爲，詳細說，要人任怨，要人盡忠，要人犧牲個人自由，當然也要自己先能任怨，盡忠，和犧牲個人自由，然後人家才能把我們的話當做話來聽。如果自己不任怨，而責人以任怨，自己不效忠，而責人以效忠，自己不能犧牲個人自由，而責

人去犧牲，那裏會發生效力？『以身教者從，以言教者訟。』這兩句話，是很有道理的。所以以身作則的消極的意義，就是要免去自己所說的話，被自己所做的事打消。除此之外，還有積極的意義，『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必偃。』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『子率以正，孰敢不正。』這一類說明上行下效的道理的話，我們當然聽得很多。固然，對於這個道理，我們不能過於樂觀。換句話說，就是假使不濟之以政刑，單以領袖人物本身行為做模範去感化，上所行的，未必下盡能效。不過在某種範圍，某種程度之內，領袖人物的行為，是可以潛移默化的作用，使下面做倣的。從前曾文正也曾說：『風俗之厚薄奚自乎，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。』因為人類有模倣心，同時也有

情感。接近領袖的人，一方面因為模倣心的作用，自然而然的會倣倣起來，同時因為情感的作用，會感覺自己不倣倣領袖的行爲，是不好意思或難爲情了。例如主席早晨八時上辦公廳，廳長就不好意思不八點鐘到廳。先生樸實勤懇，至少一部份學生，自然會學着樸實勤懇了。就是最近二三年來的情形，也可證明。最高領袖的埋頭苦幹，雖然還沒有感化到全體下層幹部乃至一般人民，也埋頭苦幹。然而比較接近的少數上級幹部，實在爲最高領袖的模範所感動，都切切實實的在分頭努力。總而言之：以身作則，雖然不完全能收上行下效之功，至少也可以除去行不願言，以阻礙風氣樹立的現象。不過領袖人物，是否能自動的以身作則，又是一個要研究的問題了。有些人以爲個

人是環境的產物，個人的思想和心理，都是隨環境轉移的。環境不改變，個人的思想和心理，是不會改變的。領袖人物，也總是人，既然是人，當然要受環境的支配，所以希望領袖人物，自動的打破周圍的惡劣風氣，由主觀的自覺，從自己做起，以作樹立新風氣的榜樣，恐怕是不易實現的空想。但是另外一種見解，却以為環境是個人造成的。如果個人沒有打破和創造環境的力量，那末，惡劣的環境，就會永遠惡劣，而不能改善。因為環境的本身，決不會不要人力，自然而然的由惡劣變為善良。所以主張個人不隨環境為轉移，却是環境受個人的支配。究竟是個人創造環境或是環境製造個人？這種雞生蛋，蛋生雞的循環理論，是一輩子弄不清楚的，我們可以不去管他。不過所謂領袖人

物，一定應該打破環境，創造環境，而不為環境所左右。因為既然能夠做領袖人物，一定是先知先覺。先知先覺的人，一方面有超人的眼光，別方面應有超人的魄力。因為有超人的眼光，所以看得清環境或風氣的惡劣，而思有以改造；因為有超人的魄力，就可以身為天下先，從惡劣的環境或風氣的包圍中突出，而作樹立新風氣的模範。所以要完成精神建設，各級領袖人物所負的責任，異常重大。我們要以身作則，為一般的倡導和榜樣，決不能假口於環境或風氣的惡劣，而寬恕自己的行為，推卸自己的責任！

第二，要根據精神建設的目標，登用人才。政府用人的標準，和風氣盛衰的關係，異常密切。政府以某種標準用人，自然就會以這種標

準爲根據，而樹立一種風氣。如果政府多用雞鳴狗盜之徒，雞鳴狗盜之行就會遍天下；如果政府多用廉潔好義之士，鄉里就會重禮義，知廉恥。說明其間的因果關係的，莫過於史實。我們且看一看歷史：『新莽居攝，頌德獻符者，徧於天下。』當時士大夫，不知所謂廉恥。但是光武『所舉用者，莫非經明行修之人，而風俗爲之一變。』致使『三代以下，風俗之美，無尙於東京者。』又『士大夫忠義之氣，至於五季，變化殆盡。』但是因爲『藝祖首褒韓通，次表衛融。』又因爲真宗仁宗登用田錫、王禹偁、范仲淹、歐陽修等以直言讜論相倡之士，於是『中外薦紳，知以名節爲高，廉恥相尙，盡去五季之陋。』這兩個史實，就是證明惡劣的風氣，可以因爲政府用人的標準得當，而變爲善良的。但是在

另一方面，如果政府用人的標準不當，良好的風氣，也可以變爲壞的。曹操柄政，崇獎蹶弛之士。冀州平後，下令曰：『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，不可以爲滕薛大夫。若必廉士而後可用，則齊桓其何以霸世？』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，而釣於渭濱者乎？又得無有盜嫂受金，而未遇無知者乎？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，唯才是舉，吾得而用之。』漢中平後，又下令曰：『昔伊摯傳說出於賤人，管仲，桓公賊也，皆用之以興。蕭何，曹參縣吏也，韓信，陳平，負污辱之名，有見笑之恥，卒能成就王業，聲著千載。吳起貪將，殺妻自信，散金求官，母死不歸。然在魏則秦人不敢東向，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。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，放在民間，及果勇不顧，臨敵力戰；若文俗之吏，高才異質，或堪爲將守，負污辱之名，見笑之

行，或不仁不孝，而有治國用兵之術，其各舉所知，勿有所遺。」因爲曹操用人的標準，只重「治國用兵之術」而蔑視道德。「于是權詐迭進，姦逆萌生，」不復以學問爲本，專更以交遊爲業，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，乃以趨勢求利爲先，而演成魏晉貴通達，賤守節的風氣。顧亭林說：「夫以經術之治，節義之防，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，毀方敗常之俗，孟德一人變之而其餘。」可見得用人的標準不當，怎樣能夠敗壞善良的風氣了。根據這種歷史的教訓，我們完成精神建設，政府用人，就應該如何的注意了。從用人的方面着手，轉移風氣，乃是一種因勢利導的最有效的辦法。因爲求功名，望聞達，乃是人的常情。而且這種常情，實在未可厚非。問題是在用甚麼方法，求得功名聞達。

如果方法正當，例如因為道德才能為世所知，致得榮達，這是沒有問題的；如果方法不正當，例如諂諛賄賂，以求倖進，那便要發生政治風紀和社會道德等問題了。然而要一般求利達的方法正當，先要政府用人的標準正當。假如政府非才德兼備者不用，一般人因為要求上進，自然會砥礪切磋，以養成道德才能，而求適合政府的標準，不會再去諂諛賄賂，自絕上進之路了。假如政府用人，全憑諂諛賄賂，一般人因為要適合政府的標準，當然就諂諛賄賂，而不願再在道德學問上用工夫了。『越王好勇，而民多輕死，楚靈王好細腰，而國中多餓人。』上面所需要，下面自然會適應的。所以從用人着手去轉移風氣，乃是順乎人情之自然，而加以誘導，比較以言語文字去勸喻感動的辦法，

要有效得多。因此我們要完成精神建設，一定要各級政府，甚至各社會法團，以精神建設的目標爲用人的標準。合乎這些標準的，不合的去。然後精神建設的目標，自然會風吹草偃的實現，而成爲一般的風氣。如果在用人方面不注意，一方面勸人要做怎樣的一個人，同時別一方面，所用的人却是一種正相反的人，那末，無論怎樣努力去轉移風氣，恐怕都要終於徒勞。例如在上的人，就是終日終年的循循勸導，諄諄告誡，要人明禮義，知廉恥；然而只用一個寡廉鮮恥的人，一切的勸導和誥誡的效力，都會立即消失。反之，假使罷免了一個寡廉鮮恥的人，其效力要超過幾十篇誥誡的文章，幾十場勸導的演說。國家進退一人，都與風氣息息相關。切不要以爲一個人的關係很小，而

不以精神建設的目標去做進退的標準了。『爵授有德，則大臣興義，祿予有功，則士輕死節。』（管子）就是說明這個道理。

第三，要根據精神建設的目標，明定政府賞罰。國家的賞罰，也是轉移風氣的最有效的手段。國家之所以能夠令行禁止的，完全靠賞罰的作用。如國家不利用賞罰大權，使他發揮作用，只聽人民根據自由意思和主觀見解去行動，則令的未必行，禁的未必止。換句話說，要轉移的風氣，未必能夠轉移。假使國家賞罰，行使得不得當，而賞其所不當賞，罰其所不當罰，換句話說，就是賞其所禁止的，而罰其所提倡的，那末，無論怎樣用文字言語去誥誡，去勸勉，決不能達到禁止和提倡的目的。因為不因賞始行善，不因罰始去惡，只能期諸少數人。大多

數人是非賞不足以勸善，非罰不足以去惡的。善惡的觀念和利害的觀念，在一般人的心理中，是站在同等的地位，有時甚且利害觀念超過善惡觀念。所以就要因勢利導，以賞罰的作用，引導其利害觀念與善惡觀念趨於一致了。換句話說，就要以賞罰的作用，使其爲善則有利，爲惡則有害了。例如好逸惡勞，人之常情。就善惡的觀念說，雖然是勞而非逸，然而一般人決不會因勞是善而反好，因逸是惡而反惡。儘管懶惰享樂爲惡事，仍就是要好的；儘管勤奮操作爲善事，仍就是要惡的。因爲在他們短小的目光中，不見得懶惰享樂有何害，也不見得勤奮操作有何利。而且在他們看來，懶惰享樂，不僅無害，且因爲得着一時的舒適，反覺有利；勤奮操作，不僅無利，且因爲目前的疲苦，反覺

有害。於是他們因為趨利避害的心理，就自然會好逸而惡勞了。所以如果沒有賞罰來操縱，而要人去掉好逸惡勞的習慣，社會上去掉好逸惡勞的風氣，是不可能的。假使這個時候，把賞罰的作用參加進去，情形就會大變。如果國家規定懶惰享樂的人罰無赦，勤奮操作的人賞有加，那末，一般的人，就會因為要避害而望免罰，因為要趨利而望得賞。要免罰，自然就要不再懶惰享樂；要得賞，就要去勤奮操作了。所以要轉移好逸惡勞的風氣，最有效的方法，就是好逸惡勞者嚴罰，就勞去逸者重賞。又例如嫌貧愛富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假使貪污可以致富，而又無別害，就會因要致富而貪污。假使廉潔一定窮困，而又無別利，就會因為不願安貧，而不願廉潔了。如果沒有賞罰來獎誘和制裁，要

人免去貪污的行爲，要社會樹立廉潔的風氣，也是不可能的。假使國家慫貪污爲厲禁，無論何人，犯者處死或重罰，毫不假借，毫不寬貸，人雖愛富，也會因爲怕死或畏罪而不貪污。再加以廉潔者賞以祿位，人將因爲廉潔而有報酬，更不必去貪污了。根據上述兩例，就可知賞罰的威力了。所以如果要轉移風氣，一定要『懸爵祿以勸民，……立刑罰以威下，……無爵祿，則無以勸民，無刑罰，則無以威衆。』因爲『人臣之行理奉命者，非以愛其主也，且以就利而避害也；百官之奉法無姦者，非以愛主也，欲以愛爵而避罰也。』（管子）這個道理，一定是沒有錯的。我們要完成精神建設，一定要國家根據精神建設的目標，明定賞罰，切實執行。凡合乎精神建設的目標的行爲，予以重賞，違反這

些目標的行爲，予以嚴罰。如果這樣，我相信精神建設的目標，決不致徒托空言，而可以漸次實現，蔚成一般風氣。

第四，根據精神建設的目標，製造社會輿論。政府的賞罰，雖然是轉移風氣的絕大的力量，然而這種力量，有時有不及之處或不足之時。補充這個不足或不及的，就要靠社會的褒貶的力量。而操社會褒貶之權的，莫大於輿論。所以社會輿論做轉移風氣的又一力量，也是非常要緊的一件事。固然，不健全的輿論足以釀成不健全的風氣，而不健全的風氣，也可以產生不健全的輿論，這本是互爲因果，互相反射的。不過我們既然決定了精神建設的目標，換句話，既然決定了理想的健全風氣，就可以根據這個目標和理想去統制輿論，使一般

輿論，漸次都獎崇合乎精神建設目標的行為，而制裁違反這些目標的現象。現在一方面能夠構成輿論力量，同時又能夠表現輿論力量的要素，最重要的是報紙、刊物，以至於電影、戲劇、小說、傳單和標語之類了。這一類東西，政府都可以在精神建設運動所必需的限度以內，加以統制。所謂在必需的限度以內，就是要這些東西，都一致獎崇政府所提倡的風氣，不要反站在不負責的地位，或以甚麼幽默的態度，去冷嘲諷刺；同時也要一齊制裁政府所禁止的行為和風氣，不要反假主持公道的口實，去替他們鳴不平。在這個限度以內，政府應有統制輿論，束縛個人自由發表意思的權利，個人也應有服從這種統制和束縛的義務。就是現在無論怎樣民主的國家，對於破壞『公共秩

序』和『善良風俗』的輿論，也要加以取締，至於俄、德、意等國的嚴格統制，更不必說。所以在這個限度以內統制輿論，決不是甚麼可咀咒的罪惡。如果不然，政府所提倡的風氣，輿論却去指摘嘲笑；政府所要剷除的風氣，輿論却去提倡頌揚；照這樣要達精神建設的目的，真是所謂南轅北轍了。例如政府提倡任怨、任咎的精神，而不徇情、不枉法，致招怨謗的人，輿論却不去與以精神的鼓勵，也隨聲附和的攻擊；挺身任咎的人，輿論却不與以諒解，也根據以成敗論人的流俗見解去批評；那末，無論何人，爲避免輿論的指摘，當然要在可能的範圍內，避免任怨、任咎的事情了。固然，這個時候，仍然有國家的賞罰，可以鼓勵或制裁，但是因爲社會的褒貶和政府的賞罰不一致，社會褒貶的

效力，和政府的賞罰的效力，雖然不致完全互相抵銷，至少也因為互相衝突，彼此的效力都要減少了。因為得於此者失於彼，失於此者得於彼，一個人受了政府的獎賞而得到社會的攻擊，或受了政府的責罰而得到社會的讚揚，無論是政府的賞罰，或社會的褒貶，對於他雖然不致完全失去力量，至少也要減少價值了。韓非子說：『賞所以勸之，而毀存焉；罰所以禁之，而譽加焉；則民中立而不知所由。』就是這個道理。假使社會的褒貶和政府的賞罰，標準是一致的，那就要因為相互為用的關係，彼此的力量，都要愈加發揮，彼此的效果，也要愈益增加了。例如玩忽職務或貪污的人，不僅政府加以罷免和處罰，受了罷免和處罰之後，社會上的輿論，也使之無顏見人，使之不能立足，一

一般人對於玩忽職務或貪污，就要更有戒心，不敢輕於一試了。所以根據精神建設的目標，製造社會輿論，也是精神建設運動的一個重要方案。

第五，根據精神建設的目標，勵行訓練。這個辦法，就是以教育做轉移風氣的手段。教育可作爲一種轉移風氣的力量，可以作爲一種精神建設的工具，乃是不可爭的事實，我們不必在理論上多加說明。以後各級學校，從小學起到大學止，乃至一切短期的或臨時的訓練班或講習所，都要根據精神建設的目標，製成具體的訓育方案，切實訓練。第一，根據訓育方案，詳訂嚴格的紀律，機械的禁止學生某些行爲，而強迫其某些動作。固然，教育的最後作用，是在使受教者『知之』。

不能僅使他們『由之』。不過我不必一定要等到他們『知之』之後，纔使之『由之』。在他們沒有了解何以不許這樣，何以定要那樣以前，機械式的禁止其這樣，強迫其那樣，不僅是可以容許的，而且是必要的。人生許多行爲，思想，以及日常生活，都因爲外來壓力（對內心的自覺而言）的強迫，由極不自然的狀況，而成爲極自然的習慣的。所以教育的方法，在開導其內心的自覺以前，應該以嚴格的紀律，機械的令其服務。第二，單只機械的強迫，只能使之『由之』。所以同時要以講解和勸導，使之『知之』。因爲如果受教者不理解何以不要這樣，定要那樣以前，在一定的環境以內，固可機械的遵從，如果換了一個環境，他們的行爲就會改變。例如在學校內，走路向左，進課堂順次序，

雖然成爲機械的習慣，但是到馬路上走路，也許會向右，上電車，進影戲院，也許會爭先恐後了，這樣行爲隨環境而轉移，就是因爲他們平日只是機械式的『由之』而不『知之』。所以如果使他們明瞭一種行爲的道理，以後在任何環境之下，他們的行爲，就不會改變了。第三，就是教職員以身作則，以示模範，而收無形感化之效。這個道理，前面已經詳說，現在不必重複了。總而言之，根據訓育的具體方案，同時並用機械的、解說的、和示範的三種方法，我相信教育是可以完成其在精神建設方面所負的任務的。過去及現在，不少的人把風氣敗壞的原因，完全歸咎於教育。這種批評，是不完全正確的。固然，現在風氣敗壞，教育也有不能辭其咎的地方，但是完全歸咎於教育，却是一件

不公平的事。根據前面所述，我們知道風氣的良否，原因很多。領袖的行爲，用人的標準，政府的賞罰，輿論的褒貶，都具有絕大的力量。教育不過在這許多要素中，占據一個地位。怎能把風氣敗壞的責任，完全推在教育身上？例如教育方面，在學校裏盡力訓練學生誠實守法，而社會輿論和政府賞罰，却不向同一目標運用，甚且和教育的目標相反而行，那末，學生一出了學校，自然會把學校辛辛苦苦訓練的成績，完全打消了。所以教育固然有他應負的責任，應盡的使命，而要他的責任和使命能夠完成，却需要其他政治社會方面的協作。

上面所述的五個方案，我相信不是空談，乃是比較切實的，也不是高調，乃是比較易行的。除了這五個方案之外，以我的笨拙頭腦，實

在想不到其他更切實、更易行、更完善而有效的辦法。不過這五個方案，是互相爲用，互相關聯的。一定要同時併舉，才能發生效力。如果缺了一個，其餘四個也會受着連累而不能充分發揮作用。剿心中賊，也和剿山中賊一樣。剿山中賊，要四方八面的圍剿。如果缺了一方，賊就會從這一方突圍而出。剿心中賊，要從政治、社會、教育各方面包圍。如果一方面佈置缺乏，或力量不夠，他就有了逃避和潛伏的機會。如果我們能夠運用精神建設的五大方案，向着精神建設的六大目標，同時分頭並進，我充分相信精神建設的偉大運動，一定可以完成，民族復興的偉大運動，也一定可以成功！

興復族民與救建神權

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

(版三廿)

周佛海著

實價八角

本書共四章：第一章說明主義的意義和性質，三民主義的內容和背景，三民主義的發生、完成和進化，以及三民主義的不可分性。第二章說明民族的發生和發展，民族主義的涵義和特質，中國民族的地位，以及中國民族運動的方略。第三章說明民權主義的根據和特質，民權發達的過程，運用民權的形式，以及四種政權和五種治權的意義。第四章說明民生主義的意思和內容，平均地權的理論和實行，以及節制資本的目的和方法。出版以來，銷數已達十餘萬，打破國內出版界紀錄，價值之高，於此可見。

上海·南京·北平·武昌

新生命書局發行

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出版

精神建設與民族復興

—實價四角—

版權所有



I-2000

翻印必究

著者 周佛海

出版者 陳寶麟

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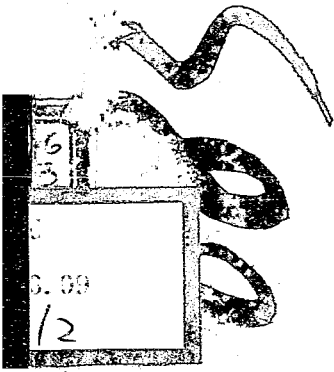
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中市 新生命書局

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 北平琉璃廠 武昌橫街頭 新生命書局

門市部 上海福州路中市 新生命書局

▲上海新民印刷所承印▼

573
777223



實價四角